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7.4

一年出版4期，以17種語言刊出

訪談

Kari Polanyi Levitt

Peter Evans,
Raka Ray,
Cristina Mora,
Ruth Milkman,
Dylan Riley,
Cihan Tügal,
Gay Seidman

川普主義的本質

Juan Piovani,
Fernanda Beigel,
Alejandro Grimson,
Agustín Salvia,
Berenice Rubio,
Gabriel Kessler

捍衛阿根廷社會學

特輯

- > 紀念Ali Shariati
- > 《全球對話》中文編輯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7卷 / 第4期 / 2017.12
<http://isa-global-dialogue.net>

GD



> 主編的話

《全球對話》的歷史

2010年的《全球對話》是從2010年的8頁通訊開始的，起初只有4種語言：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中文，而且是由簡單的微軟軟體所製作成的，並且只有4個人就完成了。7年過去了，《全球對話》已經成為了一年出版4期的雜誌，每期有40頁，並且以17種語言出版。每期的出版甚至包括來自全球超過100人的共同合作，至今已經出版31期了，包括了約550篇文章，作者來自69個國家。從一開始我們就試著要讓所有人都可以取得雜誌，不但是為了翻譯方便，也為了傳播方便。畢竟，社會學對於這個各種災難層出不窮的世界，有著相當重要的訊息要傳達。

雖然新的科技可起讓災害更加惡化，科技也提供了我們新的機會。數位媒體讓《全球對話》得以可能，但是別忘了，人類的勞動還是最基本的。雖然ISA補助些許的金額，但是這還是由年輕社會學家透過年長的學者的指導去完成的，特別是那些全球化過程中被邊緣化的國家。這樣充滿熱誠的合作是最令人興奮的其中一件事。

早些時候，版面設計者August Bagà (Arbu)提議要讓《全球對話》有個令人興奮的外觀，於是他和對於ISA三種官方語言都流利的Lola Busuttil一起成為管理編輯。Lola監督整個運作，確保每一種語言的版本都按照高的標準，這帶來了美麗的《全球對話》的誕生，並且透過網站管理者Gustavo Taniguti而出版到網站上。

當我是ISA的副會長的時候，我有了機會去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學家。那些交流的機會支持了這本雜誌的內容。當把文章編輯成可讀的形式的時候，我發現或許太多了，於是我問Gay Seidman來幫我，在她成為傑出社會學家的時候，她是記者和編輯，她於是慷慨允諾了，要把「社會學學術語言」轉譯成簡單但是優美的英文。她把注意力帶到作者上面，並且有效地執行，提供絕佳的諮詢。在Gay處理之前，Berkeley的一組研究生會把非英文的稿件翻譯成英文。

還有許多人需要感謝，首先是Robert Rojek在最早主動提供了SAGE的資金無條件支持。從一開始ISA的Izabela Barlinska就是《全球對話》的大力支持者。這過去7年來我也得到了ISA執行委員會的背書，否則這不會如此成功。我卸任會長一職之後，Margaret Abraham和Vineeta Sinha也很熱情地繼續支持。我們現在有了很棒的新主編：Brigitte Aulenbacher和Klaus Dörre，他們將會把《全球對話》帶到另一個高峰。若有任何想法或建議請不要等，立刻寫信給他們！

從《全球對話》可以看到全球歷史的漲潮與退潮，我們從2010年討論2008年的全球經濟衰退開始，然後樂觀的社會運動，像是佔領，阿拉伯之春，Indignados, piqueteros，以及其他勞工、環境、女性主義、社會正義的運動。但是從2013年開始，我們開始看見了反動和反民主的烏雲，我們把Karl Polanyi看成先知，重新學習Polanyi很久之前教導我們的，就是那些反動運動去釋放出的市場力量是同樣可能帶來社會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也同樣可能帶來民主和威權。我們對於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還有許多要學習。因此，我想我以訪談Kari Polanyi Levitt作為開始討論其父親的思想是很恰當的。

過去7年來我試著把不同國家的社會學帶進來，但是我尚未深入討論美國。在我作為主編的這最後一期，我向我7位朋友和同事邀稿，從他們有興趣的角度去探討川普主義。他們把美國放在歷史和全球的脈絡如何擺到光譜右邊，而這個反動年代的特徵之一就是將社會學放到了防禦的一端，防禦新自由主義和威權的入侵。阿根廷的社會科學家由Juan Piovani所帶領已經進行了全國的社會學防守，從事專業、政策、批判、公共社會學的研究，所以有5篇文章代表了他們的觀點，該計畫才是開始而已，而其他社會學家可以就此關注學習。

最後，我們也不該忘記了我們的先行者—那些奮力對抗威權的社會學家，像是

馬克思和伊斯蘭的思想家Ali Shariati，其於1977年過世，也就是伊朗革命的兩年前。他繼續影響著該革命，包括革命原本可以如何，以及可能如何的問題。我們現在非常需要這樣的先知，因為他們可以啟發一種在決定論和烏托邦之間的社會學。而《全球對話》是一個我們可以集體辨識和想像新的可能的地方，以避免我們這個小小地球的最終毀滅。■



Kari Polanyi Levitt和Michael Burawoy的對話，談論她著名的父親Karl Polanyi。



Peter Evans, Raka Ray, Cristina Mora, Ruth Milkman, Dylan Riley, Cihan Tuğal, Gay Seidman討論川普主義的源頭和意義。



Global Dialogue由SAGE出版社提供贊助。

中文繁體版: ISSN 2519-8688

全球對話以 17 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投稿請寄給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副主編:

Gay Seidman.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編輯顧問:

Margaret Abraham, Markus Schulz, Sari Hanafi, Vineeta Sinha, Benjamín Tejerina, Rosemary Barbaret, Izabela Barlinska, Dilek Cindoğlu, Filomin Gutierrez, John Holmwood, Guillermina Jasso, Kalpana Kannabiran, Marina Kurkchian, Simon Mapadimeng, Abdul-mumin Sa'ad,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Sawako Shirahase, Grazyna Skapska, Evangelia Tastsoglou, Chin-Chun Yi,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

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Juwel Rana, US Rokeya Akhter, Toufic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Kazi Fadia Esha, Helal Uddin, Muhaimin Chowdhury.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Andreza Galli, Ângelo Martins Júnior, Lucas Amaral, Benno Alves, Julio Davies.

印度:

Rashmi Jain, Jyoti Sidana, Pragya Sharma, Nidhi Bansal, Pankaj Bhatnagar.

印尼:

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n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Sina Bastani, Mina Azizi, Hamid Gheissari, Vahid Lenjanzadeh.

日本:

Satomi Yamamoto, Masataka Eguchi, Kota Nakano, Aya Sato, Kaori Sayeki, Riho Tanaka, Marie Yamamoto.

哈薩克:

Aigul Zabirow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波蘭:

Jakub Barszczewski, Katarzyna Dębska, Paulina Domagalska, Adrianna Drozdowska, Łukasz Dulniak, Jan Frydrych, Krzysztof Gubański, Sara Herczyńska, Kinga Jakiela, Justyna Kościńska, Karolina Mikołajewska-Zajac,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Gabler, Anna Wandzel, Jacek Zych, Łukasz Żołądek.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ş,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Maria-Loredana Arsene, Timea Barabaş,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Radu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Dan Gitman, Alina Hoară, Alexandra Irimie Ana, Alexandra Isbăşoiu, Rodica Liseanu, Cristiana Lotrea, Mădălina Manea, Anda-Olivia Marin, Bianca Mihăilă, Andreea Elena Moldoveanu, Rareş-Mihai Muşat, Oana-Elena Negrea, Mioara Paraschiv, Codruţ Pînzaru, Ion Daniel Popa, Anda Rodideal, Adriana Sohodoleanu.

俄國:

Elena Zdravomyslova, Elena Nikiforova, Anastasia Daur.

臺灣:

何經戀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媒體顧問: Gustavo Taniguti.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全球對話》的歷史

2

巨變的形成：訪談Kari Polanyi Levitt

Michael Burawoy, 美國

5

> 川普主義的社會根源

在川普經濟民族主義的背後

Peter Evans, 美國

11

川普主義和白人工人階級

Raka Ray, 美國

14

移民和川普時代的政治

G. Cristina Mora, 美國

16

川普對勞動的侵害

Ruth Milkman, 美國

18

美國的霧月？

Dylan Riley, 美國

21

列寧右派的興起

Cihan Tuğal, 美國

24

在巴西和南非的民主失序

Gay W. Seidman, 美國

27

> 捍衛阿根廷社會學

仔細檢視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阿根廷

30

勾勒阿根廷社會科學的輪廓

Fernanda Beigel, 阿根廷

32

阿根廷的社會和文化多元性

Alejandro Grimson, 阿根廷

35

當代阿根廷的社會不平等

Agustín Salvia和Berenice Rubio, 阿根廷

38

研究阿根廷的社會資本

Gabriel Kessler, 阿根廷

41

> 特輯

Ali Shariati：被遺忘的伊斯蘭社會學家

Suheel Rasool Mir, 印度

43

《全球對話》中文編輯

何經戀, 臺灣

45



> 巨變的形成

訪談 Kari Polanyi Levitt



| Kari Polanyi Levitt.

MB：讓我們從最一開始開始講起。我們習慣把Karl Polanyi看成是匈牙利人，可是他事實上是在Vienna出生的，對嗎？

KPL：是，有趣的是，我爸和我都是在Vienna出生的，我媽媽則是在距離Vienna不遠的一個小鎮出生。Vienna毫無疑問是一個知識的重鎮，是奧匈帝國的核心。

我的祖父和祖母是從Vienna開始的，我祖母Cecilia Wohl被她的父親從俄國Vilna送回來去學貿易。因為教育，她說俄語和德語。我祖母後來遇到我祖父Mihaly Pollac-

Karl Polanyi 是社會學中的經典思想家。其著作《巨變》已經是社會學各個領域必讀經典。影響力也遠超出社會學之外，到了經濟學，政治學，地理學，人類學。其批判在過去 40 年被奉為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認為它毀壞了社會的肌理。該書同時也討論了商品化的起源和後果，以及對商品化進行對抗的社會運動，包括了法西斯主義，史達林主義，以及社會民主，顯然對於我們當前的全球處境息息相關。Karl Polanyi 於 1886 年出生，1964 年過世。本篇訪談是訪談其女兒 Kari Polanyi Levitt。她描述了其父親的一生，以及《巨變》一書的誕生故事。她也指出了其父親和母親 Ilona Duczynska 的特別關係，還有她自起成為政治運動者和知識分子的一生，包括匈牙利階段，奧地利階段，英國階段，以及後來的美國階段。Levitt 博士作為一位經濟學家居住在加拿大 Montreal，寫了很多本書，包括了《從巨變到金融化》(From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o the Great Financialization) (2013)，已經編輯了《The Life and Work of Karl Polanyi》(1990) 一書。這篇訪談是 Michael Burawoy 在一場 Karl Polanyi 會議結尾與 Levitt 博士的對話縮短版，是由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她的同事於 2017 年 1 月 10-13 日在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舉辦 (Linz, 澳洲)。

sek，他是一個匈牙利的猶太工程師，會說匈牙利語和德語。所以整個家庭都是會說德語的，而不久之前，我才從通信中得知我爸一直到Budapest的中學以前都還沒學過匈牙利語。

我爸的匈牙利期間很重要，也被俄國影響形塑，這是透過了俄國的社會主義者而來，那時和社會民主是很不一樣的。俄國社會主義更靠近農村和農民，有著無政府主義的元素，公社則是當然很重要的一環。

我必須說這樣的俄國影響在他父親那邊被平衡掉了，因為其相當喜愛英國的傳統。如果有兩個人影響了我爸最深遠的話，我會說一個是莎士比亞，因為我爸把他的書帶上戰場。另一個我會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MB：然後也有俄國革命者的影響，其中一個是Samuel Klatchko。

KPL：是的，Samuel Klatchko是個特別的人，住在Vienna。他是個非官方的使者，連結了俄國革命家和國際與歐洲的其他革命者。其從Vilna的一個猶太家庭而來，並在Kansas俄國公社渡過的年輕時光。該公社並不持續很久，後來瓦解了，把3000牲畜趕到Chicago，然後造訪了New York的國際女性成衣工會。他是個運動者，而Kansas公社的名字則是以一位俄國人Nikolai Tchaikovsky命名。

但是當Klatchko到Vienna的時候，他和Pollacsek家族建立了有好的關係，並且招待那些從俄國來買馬克思書籍或是做其他事情的人。

而我爸告訴我一件事情我永遠沒忘記，那就是這些人對他有很深刻的印象，也注意到表弟Irvin Szabo。他對無政府社會主義者很有善，那些人有些沒有鞋子，是用報紙把腳包起來的。我爸爸對於這些人的英雄主義和勇氣印象很深，並且有種浪漫的想像，不過雖然浪漫，但是更是一種尊敬，特別是巴古寧，因為我想他是最偉大的人了。

MB：而這樣對於革命者的同情持續了一生，也解釋了他對布爾什維克的模糊態度？

KPL：是的，這持續了一生。這也解釋了其對於俄國社會民主人士的敵對態度，而其後來則成為了布爾什維克的多數組成。

MB：您父親在學生的時候就熱衷政治了，對嗎？

KPL：是的，他是一個學生運動的創始社長，叫做伽利略派(Galileo Circle)，出版刊物Szabad Gondolat，意思是「自由思想」。其反對君主專制，寡頭統治，教會，也反對奧匈帝國。那不是個社會主義運動，但是許多成員是社會主義者。而最後也招納了來自高中和大學的年輕人，其每年開設了2000班的識字課程。其主要活動是教育。

MB：然後一次大戰發生了。

KPL：他在戰場上是騎兵軍官，為俄國作戰。處境是很可怕的，對奧匈帝國和俄國兩邊都很可怕。他得了斑疹傷寒，很可怕。他告訴我說，他最後他的馬跌了，壓在他身上，他想他鐵定死了，不過醒來後是在醫院裡面。

MB：然後戰爭後有了匈牙利革命。

KPL：1918的匈牙利革命結束了戰爭，帶來了Count Karolyi的第一共和，其也是該年秋天第一任總統。所以大家通常稱紫苑或是菊花革命，或是其他秋天的花名。

後來就是短命的議會的革命，在1919年的8月就結束了，被匈牙利知識份子、運動者、共產黨人、社會主義者、自由派的反革命所破壞了。

MB：所以你父親在革命結束前就離開了，是嗎？

KPL：是，結束前離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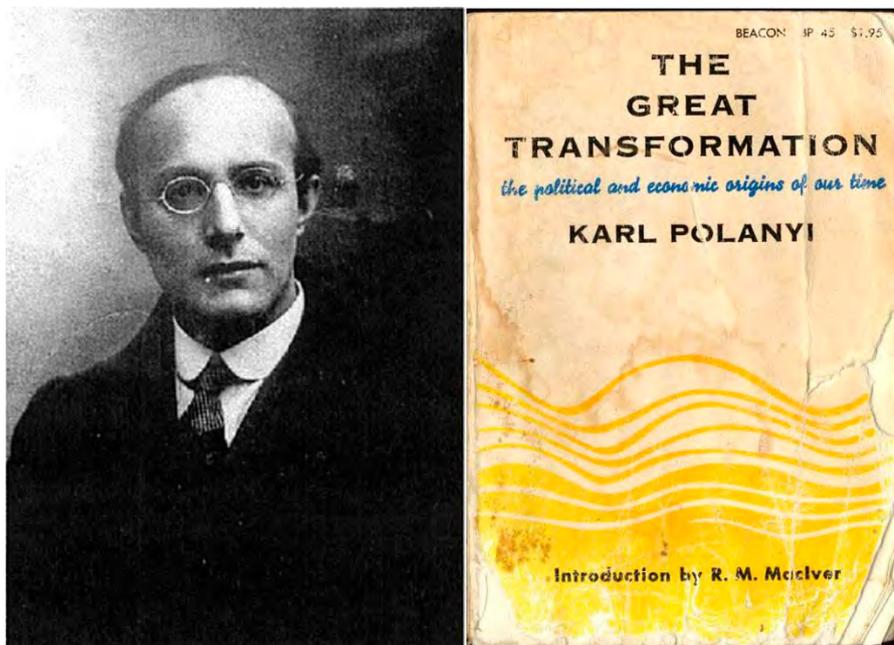
MB：他怎麼看匈牙利革命。

KPL：他態度是曖昧的，這和許多其他人很像。我想他一開始是歡迎整個國家都建立議會，但是當議會決定要把商業和一切事物國有化後，他想這一定無法善終。而事實上也是。

MB：所以匈牙利共產黨領導從Budapest逃到Vienna？

KPL：是的，流亡的共產黨有兩個領導Bela Kun和George Lukács。兩人之間有敵對，而且有趣的是我媽在1919年於Moscow的時候是有牽扯上的，因為我媽的語言能力和教育程度，他和Karl Radek於同一間辦公室，組織第二次共產國際。當她回到Vienna後有人轉交資源給她要給共產黨人，以鑽石的形式，並且裝在牙膏裡面。她後來把她交

>>



給Lukács，因為作為銀行員的兒子他或許比較值得信賴。

MB：但是這個時候妳母親和父親還未在Vienna相遇，而是在下一年，也就是1920才認識，對嗎？

KPL：那是命運的安排，那在一個村莊，由匈牙利共產黨和左派組成的會議，加上一個Vienna的祝福者。在一個眾多年輕男性的場合，沒人料到我媽會被一個年長10歲的男士所吸引，我母親的人生遠遠落後這個沮喪在角落自己寫筆記的人。

MB：但他們有著非常不同的性格，一個比較運動者，一個比較知識分子。一個在外面征戰，一個埋首研究。

KPL：是也不是。我爸其實相當活在當下，他為公眾寫文章，只要有人看，他就會寫他要說的。只要有人出版，他都可以。在匈牙利如此，在Vienna如此，在英國也是如此。

所以他非常活在當下的份為中。他是知識分子，沒錯，但是他不是自我陶醉的知識分子——一種知識分子的自戀，不論到哪裡都講同樣的東西，但我爸不是這種，一點也不是。

我媽則是從匈牙利革命開始就有著非常顯著的資歷。她接下來的人生沒有事情可以超過這個了，但這也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你知道，一旦你年少得志，接下來的人生都很難超越之前的成就了。

MB：所以他們都悲傷的經驗，不過1923有

件事情很特別，那就是妳出生了！妳的父母相當高興，彷彿回春一般。

KPL：是的，按照他的說法，我的出生讓我爸得以走出憂鬱，這是私人的事情。然而，他卻寫了很多關於這件事情。他寫他對於他的世代的責任，以及那些糟糕的事件，特別是那些無意義且愚蠢的戰爭。他寫了一次大戰，寫其如何沒啥改變，但是那是什麼卻也從來沒被他說清楚。那就是個糟糕的屠殺，人類的災難，而我父親認為他們的世代有責任。

而那種責任，也就是社會責任，之於世界，之於國家，我也想知道這是否是那個世代的集體特徵，以及那種責任意識是否過去了。我們現在仍然看到有人——特別是知識分子——還持有這種對於世界的社會責任感嗎？

MB：這是很特別的世代，原因很多。但是其中之一是紅色Vienna，這是1918到1933年社會主義對Vienna的重建，這些年也和您父親重疊。

KPL：是的，紅色Vienna是歷史上一個驚奇的一段時光。那是一場地方社會主義的實驗。那時工人是有特權的，而且是一種社會特權，享有服務，享有集體住宅。卡爾馬克思大院當然是個傑出的案例。

但是不僅僅如此。那是的文化氛圍是不一樣的，像是我爸沒有任何身份地位，沒有教職，但卻可以教授社會主義等的公共課程。他在金融的期刊挑戰Ludwig van Mises的市場導向思想，Mises會回應，我爸也會。那裡有學院之外的知識生活。

MB：你對這段期間記得了多少？

KPL：我只是個小孩，記不了太多，但是我記得我參加的很棒的夏令營，那是在Salzburg的最好的湖邊，是由社會主義運動所組織的。人們從世界各地前來參觀紅色Vienna，那是現代都市的最好的一個範例。雖然我的父母親都沒有對社會民主很有好感，但是兩人都承認他們在紅色Vienna的時光是特別且值得回憶的。那也是我唯一一次我聽到我媽讚美社會民主黨人。我爸也差不多。

MB：1922年你父親寫了一篇著名了文章論社會主義計算，是支持另外一種社會主義：公會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是被Vienna的地方社會主義(municipal socialism)所影響。

KPL：這邊要注意，那時世界上沒有社會主義經濟，對吧？俄國才剛從內戰中走出來，所以有知識分子在辯論如何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經濟，Mises開了第一槍，他是寫文章說那是不可能的人，因為他說沒有價格市場的話，沒有一個理性的方式可以分配資源。我很確定學經濟的一定很熟悉這個說法，而Polanyi則挑戰了這個論述，用了一個組織合作的社會主義模型去反對，部份是以Otto Bauer和G.D.H. Cole為基礎。

MB：當你父親在Vienna的時候，其對於俄國1917革命的看法為何？

KPL：首先，第一次俄國革命是1917年，也就是二月革命，該革命結束了戰爭。他的看法是那是很好的，因為就像所說的匈牙利人，他希望看到戰爭結束。戰爭沒人喜歡啊，所以戰爭結束了，革命被歡迎了，我想是這樣的。

MB：十月革命呢？

KPL：對我父親來說二月和十月革命都是布爾喬亞階級的革命。他們是法國革命以來的後續的最後一波，席捲歐洲，然後最後到了俄國，他是這麼說的。

MB：所以真正革命發生在集體化和五年計劃之後？

KPL：是，我想他會說社會主義誕生在五年計劃之後，大概在1928或1929年。在那之前，俄國是個農民社會，是個農業國度。

我們現在有篇他的文章寫作於1940年的Bennington，最近才發現的。那裡他說明了俄國的內在困局，簡單說，工人階級是共產黨的基礎，他們控制城市並且依賴農民，農民控制鄉下的食物供給。但是也又另一個外部困局，對於俄國農民來說，他們沒有辦法出口穀物，那是因為國際市場在大蕭條之後已經瓦解了，可是穀物是那時俄國的重要出口。

MB：所以這已經相互矛盾了，是嗎？我們當然會聽到他替社會主義革命和參與民主背書，但是他似乎是支持史達林主義的？

KPL：是的，但是像是其他人指出的，那是有脈絡的。而且他思想有趣的地方，也或許是矛盾的地方，就是他的論點不是從一個單一原則導出的，而是從處境和可能性而來的。

第一個極端是：現實，自由——什麼是當時俄國現實處境和可能？你有個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也有農民不想被國有化，想要自己的土地。他們的確有土地，也有權力，掌控的食物供給。

然後裡有個國際的處境。後來有了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只有在英國我爸真正成為了蘇聯的支持者，脈絡則是在德國擴張主義和納粹主義之間衝突而導致。

MB：所以你父親在1933年離開Vienna。

KPL：是，他因為法西斯而離開了Vienna。那是由一個知名經濟期刊Der Österreichische Volkswirt編輯委員所下的決定。我父親是編輯中的領導人物，而委員會認為我爸英文很好應該去英國。我父親有聯絡人，於是1933年出發前往。他持續發表到之前的期刊，只是該期刊於1938年停止出版了。

我們全家沒有一起過去，我爸於1933，我則是1934被送到英國。我和非常好的英國朋友Donald和Irene Grant住在一起，他們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為學生基督運動工作，並救助那些戰後的貧窮奧地利人。這也是為什麼我會認識我朋友。我媽後來1936年，也就是兩年後。

MB：讓我們回到你父親在英國的時候，他那時做些什麼？

KPL：當我1933年到達的時候，他沒有正式工作。他的支持來自Betty和John MacMurray以及Grant家庭，他們都屬於基督左派，或是基督社會主義者。那裡也有共產主義者

>>



和宗教人士，多數是新教徒。

他寫了一篇關於法西斯主義的重要文章，被認為是對基督價值的輕蔑，這是在他共同編輯的書《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Revolution》中寫的。我父親帶領了一個英國基督教朋友的讀書小組，讀馬克思的早期著作，包括《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巴黎手稿》，出版於1932年。他在帶領的時候親自為他們翻譯成英文。

他對於這些工作很雀躍。我知道他與他們之間共識的意義，所以我會說馬克思的早期著作是馬克思和Polanyi的共同起點。

MB：他在書中也說了這麼多，而英國對他的思想產生了什麼影響？

KPL：直到1937年以前，我父親受雇於工人教育組織(WEA)，那是一個非常大和非常老的教育運動，英國是把它連結到Ruskin College，這裡讓工人階級的學生若是無法上大學就可以受到教育。

我爸有機會到Kent和Sussex教書，他在那邊和一些家庭過夜，更了解的工人階級的生活，並且很驚訝他們的文化貧脊，Vienna雖然比英國還窮，但是文化素養比英國高。透過這樣的比，我父親甚至認為奧地利是一個在貨幣上來說比英國更窮的人。

他被要求教授的課程是英國社會經濟史，但是他其實一無所知這個領域，若你看到《巨變》一書的後面，你會看到他研究的範圍之大，這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其奠定在李家圖、馬爾薩斯等其他關於工業革命的作品之上。

所以我媽寫在《The Livelihood of Man》一書前言中的說的，也就是我父親是在英國開始研究市場社會的源頭，讓人類遠離人性。

然後當然他也研究的英國的階級體系，階級包括了說話的差異，並認為和印度的種姓制度很像，也和美國的種族主義很像。

MB：1940年Karl Polanyi被邀請到美國的Bennington College去演講。

KPL：是，在Bennington他獲得了2年的獎助，這是來自洛克菲勒基金會去贊助撰寫《巨變》一書的。他得到了Bennington的主席的很大支持，但是要跟基金會報告。但不論他寫什麼，基金會都不喜歡看。他們很懷疑我父親可以在大學任教。

他寫說他對於「匈牙利法律，大學教書，哲學」更加感興趣。說喜歡哲學真的是不合基金會，但是無論如何他的獎助被更新了，兩年後，這時是1943，我爸非常想回英國，不想留在美國。他想參與英國的戰後規劃，但這時候史達林格勒戰役扭轉了情勢，很清楚的是盟軍會勝利，他最後留下兩章沒寫完，你看書就會發現是那兩章，不是最後一章，而是最後一章之前的兩章。

若他有寫完，按照他的書的架構，那我想「一般人的偉大計畫」將會是他想要寫進那兩章的，但是他留給了同事，而對於那兩章也有很多的爭議。

MB：但是他後來到了Columbia 大學任教，只是你母親被禁止進入美國，所以在加拿大定居了。

KPL：另外一個選擇就是留在英國，那裡我爸可以繼續為WEA工作，但是很明顯的是，他真的有話要告訴世人，有書要寫，有工作要做。而在英國那不會在任何學校有分工作。這是很清楚的，所以1947年Columbia提供了工作，就是以《巨變》這本書為基礎，該書由該校的Robert MacIver所寫

>>

「讓市場機制成為人類的主要引導力量和環境，將會走向社會的毀滅。」

Karl Polanyi

序，其經濟學的制度論相當有名，這和我父親的取徑是符合的。然後，我母親於London被告知其不被獲准進入美國，這是的頭痛的問題。我爸非常之失望，想要我母親去說服美方讓她入境，但她不願意。但那也不可能。所以我爸後來就想說或許可以搬到加拿大，於是最後說服了我媽。於是他們在Toronto郊區有了一間很漂亮的小房子，那時是1950年，他像學生一樣通勤，於耶誕節和彩蛋節以及暑假期間回來。

MB：他的研究也轉向了一個新的方向，變成對人類學更有興趣。但是我想這可以是另外一次對話的主題了。謝謝妳對我們描述Karl Polanyi 的一生！妳讓我們知道《巨變》一書的誕生歷史和脈絡，我想我們更了解這是個20世紀非常不同的歷史經驗交織的產物，也因此至今仍如此重要。■

> 在川普 經濟民族主義 的背後

Peter Eva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國, ISA經濟與社會研究員會(RC02)委員, 未來研究委員會(RC07), 勞工運動研究委員會(RC44), 社會階級與社會運動(RC47), 和歷史社會學研究委員會(RC56)成員。



川普總統的美國優先修辭。

「經濟民族主義」有其受尊敬的歷史。從 Alexander Hamilton 到 Friedrich List, 再到其於拉美、非洲、亞洲的 20 世紀的繼承者, 經濟民族主義被稱為是貧窮國家的知識和意識形態的工具, 用來「趕上」富裕的國家。而川普的「美國優先」修辭和英國的經濟全球化被脫歐拒絕

>>

之後，代表了經濟民族主義的興起嗎？若仔細檢視，會看到這是天大的誤解。

川普版本的經濟民族主義接合了無效的霸凌和華麗的詞藻。「美國優先」是川普最愛的飄標語，而雖然他的經濟民族主義修辭是奠基在全球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失敗而受到歡迎的，但是卻對於全球資本主義一點威脅也沒有。其對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 的批評或許讓人一時很高興，可是對於貿易協定的既有內容是一點改變也沒有的。要求美國企業不要把工作帶出美國的說法可謂是個很好的一場秀，但沒有證據顯示這些要求會對全球生產鍊產生什麼影響。

所以為什麼史蒂夫班農一很不幸地是川普幕僚中最接近所謂的「大圖像」策略者的人一會說經濟民族主義是該川普政府三個支柱的其中之一呢？班農就像川普一樣，知道經濟民族主義是一種可以被挪用來激起那些累積已久的不滿、埋怨，激起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的訴求，並且可以用來削弱政黨精英的正當性。

從二戰之後的資本主義黃金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並未給多數美國人帶來好處。停滯的工資成長結合了收入所得的集中在少數的 0.001% 的人中 (Piketty, Saez, Zucman)，而在千禧年之交，經濟痛苦被轉換到了低教育程度白人的藥物成癮的流行擴散，和前所未有的低預期壽命。

傳統的美國政黨精英發現自己被困在盒子裡面，他們不願意去冒風險承受大眾動員挑戰政黨，但也無法抵擋大眾日益上升的憤怒，兩黨精英已經無法說服美國一般民眾以自由貿易為主的全球化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

川普侵略性的修辭和對經濟民族主義的擁抱讓他和傳統的政治精英切割開來。他把結構導致的資本主義負面結果化約成美國和外國談判技巧的衰弱，彷彿這種弱點可以簡單地被攻擊性的談判策略所翻轉，所以這種經濟民族主義巧妙把川普的經濟政策轉移焦點：讓首都可以享受更多的剩餘價值，去管制化，保護那些掠奪性的經濟行為。

這種政治技巧讓經濟民族主義成為其政綱的第二根支柱。川普仍然是當代美國總統中最不受歡迎的人，但是經濟民族主義是他最有效的意識形態工具。沒有了它，他只剩下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兩個意識形態武器了。

英國脫歐提供了互補的觀點去看「全球自由市場帶給了所有人繁榮」這個信念如何破產？大衛卡麥龍或許預設了一般的英國人會和他一樣對於 London 的銀行家們有著不減的熱情，其獲利是以其位於全球金融市場的特殊位置為基礎的，但是這也讓英國人直接投票否定了，這種公投是從柯林頓到歐巴馬也都不敢做的事情，所以英國政治精英仍然處於驚嚇狀態

之中。

川普和英國脫歐並沒有對全球資本榨取獲利的能力帶來任何威脅，但是他們或許意味著 (或是肯定了) 自由主義全球化下層政治基礎的反轉。在全球北方，政治精英不再認為列寧的名言「民主共和是資本主義最好的政治庇護所」是理所當然的了。對精英來說，讓一般人民去對全球資本主義投票是有風險的，而選民也不信任精英，質疑全球化帶給他們的好處。精英和大眾都對於自由民主體制有疑問，像是 Wolfgang Streeck 所說的，「資本注意和民主的婚姻已經破裂了。」

在全球南方，這個議題甚至更為重要。南方的政治人物了解其必須要和全球資本開啟的政治空間進行操作。習進平很小心地不要讓人覺得他是經濟民族主義者，這在 Davos 論壇上可以看見。即使巴西的驚奇勝利，中國、印度在 WTO 的新自由主義的論述是很競爭的。他們不去主張民族主義目標的正當性，反而去策略性地和北方站在一起，遵從偽善的自由貿易規則。然而，這已經不是 David Harvey 所描述的十年前的世界了。市場的影響力或許吸引了鄧小平，但是習進平不是市場的真正信仰者。智力的皮諾切死了，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忠誠要像南非的慕貝基那樣是很難找到了。

即使全球南方的領袖對於新自由主義不信任，但是也難逃全球資本主義的威，並且也沒有辦法像川普這樣打經濟民族主義的牌。沒了這張牌，若新自由主義失敗，那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就是政客所能打的牌了。

Cihan Tuğal 描述的爾多安在 [土耳其的演變](#) 就是一個令人警惕的例子。從一個「中東最世俗且最民主的國家」開始，爾多安的正義與發展黨首先擁抱了資本新自由主義。他發現新自由主義無法提供傳統民主政治一個政治上的霸權的時候，轉向了 Tuğal 所說的「硬獨裁」並且以「大眾動員」和「政治狂熱」為基礎。

印度莫迪政府也是同樣主題的不同版本。最極端的宗教偏執在這個有了 70 年歷史的民主國家 (雖然不完美) 出現了，而千禧年時印度對於資本新自由主義的擁抱把多數的窮人拋在後頭，而莫迪的印度人民黨也轉移焦點，透過印度教沙文主義策略，恐嚇穆斯林，也恐嚇其他「外來者」和「不忠誠」的印度教人。

不論焦點是否是川普，全球資本主義都沒有受到「經濟民族主義的興起」所威脅。真正對於一般大眾的威脅是反動政治的興起，他們沒有政治信念和能力去挑戰全球資本新自由主義。

川普是個全球威脅，這不是因為他是經濟民族主義者，而是因為他是全球最危險的軍事機器的總指揮。看他目前為止的政策，與其說他是經濟民族主義者，不如說他是個發現了經

濟民族主義可以用來轉移選民焦點的工具的一個政客。其他必須忍受資本主義失敗但是又被全球資本權力所排除在外無法打經濟民族主義排的領導人是可可能使用更有害的政策去去保住權力的。

沒有所謂的「不可避免」的邏輯迫使我們去接收資本主義的失敗，也不能迫使我們去接受那些政客用來保有權力所想出了可怕政策。除非我們由下而上進步動員，政治精英會一直認為經濟限制讓轉型無法展開，但是政治上的非預期結果可能會開啟無法預測的可能，也可能導致失望的倒退。

雖然川普透過經濟民族主義想要努力掩蓋其回到反動資本主義的本質並沒有讓他的支持度增加，但是美國政治人物中最受到歡迎的是桑德斯，他做了一見美國政治中前所未有的事情：以社會主義為號召成為民主黨的總統參選人之一。■

來信寄給 Peter Evans <pevans@berkeley.edu>

> 川普主義和 白人工人階級

Raka Ra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國



川普的核心支持者：白人工人階級

在媒體上或是學術界中，常常會看到把那些投給川普或是參加在維吉尼亞州 Charlottesville 的右翼抗議事件是「憤怒白男人」。像是華盛頓郵報問：「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白男人這麼生氣？」社會學家 Michael Kimmel 認為「憤怒的權利意識」(aggrieved entitlement) 聚集了這些人。在去年美國大選之後，有一個非常清楚的數據，就是 71% 的未上大學的白人男性投給了川普，而過半數的持有大學學歷的白男人 (53%) 也投給了川普。

雖然左派或右派都用了「憤怒男性白人」來描述這群選民，我認為我們必須更仔細地檢視每一個環節。這群投票者同時是男性、白人、也是工人階級。種族、階級、性別必須被分析，理解，放在一起討論。

在美國，福特主義的衰落以及「好」

工作的消失並不是階級的討論議題。在 20 世紀中，美國的福特主義提供了好的工作，像是製造業的生產線，標準化的產品，高工資讓工人可以買得起其生產的產品，以及受保障的雇傭。但是福特主義在現實中有更多的意思。福特主義以大規模工業生產和國內消費主義為基礎，從來不只是資本主義的特徵而已。它同時也反應的父權制度，也就是福特主義的意識形態預設的家庭的工資基礎，認為一分受人就可以支持整個家庭。而家庭收入這樣的制度導致了男主外(生產)、女主內(消費)的分工，男人而非女人必須得到好的工作，這樣性別化的預設讓女人要待在家中，加上不平等性別工資，再生產了這樣的性別分工。的確，在男性心底最深處對於自己身為男人的理解是有著根深蒂固認為自己必須負擔全家家計的想法的。

>>

被排斥在家庭工資收入制度之外的是那些收入不高無法撐起一家人的那些人：黑人和移民。福特主義因此讓白人技術藍領階級工人享有特權，這也排除了那些未婚或沒有另一半的女性，以及那些另一半的工資總是無法支持全家家計的女性。同時政府在這個時候也投資在健保和教育，因此養老和好的生活這樣的期待是讓白人工人階級覺得可得的圖像。

福特主義的衰落也和女性社會運動以及種族平權運動的興起同時發生。這些運動訴求工資平等，生育權利，言論自由，反戰，性解放。此外，福特主義衰退和家庭工資下降帶來了雙薪家庭的產生，挑戰的傳統的家庭工資的制度。而現在全球化的金融化資本主義的時代，製造業被移到低工資的國家，許多工作也因為生產自動化而消失了，新的趨勢把女性納入了勞動力市場，國家進入、企業退出社會福利。

過去40年，白男人的中位數收入在控制通貨膨脹之後一直沒有起色，而白人女性收入成長了幾乎兩倍。黑人女性的中位數收入也成長了超過兩倍，而黑人男性的收入也稍有起色。即使在大衰退期間，白男人，黑男人，黑女人也都有成長，但是白男人的收入成長只集中在富人階級。

因為福特主義也是關於階級、種族、性別，對於其衰落的回應也奠基在這三個面向：當白人工人階級丟掉工作，他們失去了男性尊嚴，失去了對女性的控制權力，失去了以往鄉對於有色人種的優勢，他們失去了過去的自己，雖然「憤怒的權利意識」聽起來有道理，但是我認為不妥當。

哲學家 Nancy Fraser 對於兩種美國政治抗爭的分類：重分配抗爭和認同抗爭，我認為提供了有用的觀點去思考這個問題。她定義重分配抗爭是在爭取物質平等，包括收入，財產持有，工作，教育，健保。重分配指向了社會經濟的不公平。而認同的抗爭則是指向了象徵

層次的不公平，像是對於邊緣團體的文化宰制，不被肯認，不尊重，像是同志、跨性別、黑人、女性等。那是對於尊重重要包容的爭取。

雖然 Fraser 在分析的層次上把認同抗爭和重分配抗爭區分開來，但是現實上人們的生活中，這兩者是交織在一起的。沒有大學學歷的白男人在2016年同時投給了重分配和認同：他們想要被肯認為男人，因為他們不在是撐起家計的一家之主，因此害怕失去男人的社會地位。許多人甚至認為其身為白人的身份被取笑，被認為頑固，且女性越來越有權力，而國家明顯透過積極平權法案偏好有色人種。

美國右翼比左翼更了解這種心態，並且有辦法透過文化論述去取得這些人的支持，像是：

- 應得和不應得的貧窮：有些人不想工作，但是有些人是因為被解僱。

- 本土主義：移民不但強走了飯碗，甚至把原本很白的美國玷污了。

- 男人應該是負擔家計的人：也暗示了想要領導的女人應該認清自己的本分。

這些成功的認同和重分配的論述開啟了一個憤怒白人工人階級的政治場域。

除了少數的例外，美國左翼的討論中，重分配和認同是脫勾的。經濟正義的政治、文化正義的政治、環境正義的政治通常是彼此敵對的。像是 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的確結合了重分配和認同的政治，不過尚未受到廣泛迴響。雖然要左派們團結總是比較困難的一這有許多因素，是論述的也是物質的一但是這樣一來，右翼抬頭，並且取得的白人工人階級的支持。■

來信寄給 Raka Ray <rakaray@berkeley.edu>

> 移民 和川普時代的政治

G. Cristina Mor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國



川普正在翻轉美國立史的原則：美國是個移民大陸

2016年11月大家討論的是誰會讓美國偉大，誰又會帶來道德和經濟的衰退。而這辯論的中心是移民的議題，大家會聽到「壞蛋」和「罪犯」等詞去說墨西哥或是其他國家來的移民，這樣把移民和罪犯劃上等號的修辭，連同其他像是工作消失等的討論，可謂激勵了一種民族主義、反移民的情緒，這樣的情緒在川普於共和黨大會上達到高潮，川普站在美墨邊界的背景上，支持者高喊「蓋圍牆」。

對許多研究移民的學者而言，川普這樣的議題炒作可說是個危險的錯誤，理由有三。首先，移民在過去10年是個零合的局面，意思是說每年的移入和移出人口是一樣的，而最新的資料顯示了有更多的墨西哥人移出美國，而非移入。而儘管政治上對於突然湧入的「非法」移民入侵美國這樣的討論不曾休止，美國的大規模移民時代已經結束了。第二，許多的研究包括了政府的國會預算辦公室的報告指出，移民提供了經濟成長的淨值，所有移民，即使是尚未獲准的移民，都繳稅，而且移民二代成為了這個國家最多的企業工作人口。還有，移民比起本地出生的人口要更少地註冊公共補助福利，這是一個被很多政治人物和部落格警告「社會福利女王」所忽略的事實。最後，移民會想要融入，更不可能成為國家的文化威脅，大

多數的移民，特別是小孩們，都學英語。而且多數移民都有宗教信仰。事實上，所謂的「壞代」墨西哥移民多數是信仰基督宗教的，這個事實讓雷根總統宣稱拉丁裔移民是共和黨人，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但是儘管這樣的研究已經很多了，對於移民會帶來危險的政治操作仍然佔據每天的頭條。這是因為右翼的政治策略成功而導致嗎？不太全然。中間派媒體的主流民主黨人也有份。譬如，紐學時報雖然不像其他右派媒體那麼直接，但是也常常報導移民的成本和犯罪，以及對社會的益處。而儘管歐巴馬政府通過了DACA（兒童移民暫緩遣返法案）¹，其遣返移民的政策和布希時代是一樣的，而且遣返的移民數超過了其前兩任總統總和的兩倍，這個紀錄讓他成為「遣返統帥」。雖然歐巴馬著重在遣返新的移民，而非已經生根落腳的移民，但是這個作法並沒有讓那些移民權利運動者所期待的一套完善的移民法規改革所滿意，這似乎背離了他當初競選的「是的，我們可以」的承諾。

然而，民主黨會支持移民權利的這種想法還是一直持續到2016年11月。提姆肯恩作為民主黨的副總統候選人在競選演說的時候準備了西班牙文的講詞，承諾會修改移民反歸，而希拉蕊柯林頓則在德州和佛州的競選活動時承諾會作到歐巴馬時代該做而沒有作到的移民政策。拉丁裔的遊說團體非常看中這些競選承諾，動員人們去投票，保住了西南部的州也讓第一為拉丁裔女性進入了參議院。

亞裔的遊說團體也不遑多讓。雖然人數少了很多，亞裔團體組成了移民權利運動的很大一部分。選前一個月，亞裔團體宣稱亞裔投票者會讓那些可能翻盤的州像是維吉尼亞和內華達決定是紅是藍。他們也發動了投票註冊的活動，警告民主黨人要把移民改革作為政綱的核心部份。

但是儘管這些努力，拉丁裔和亞裔並無法左右選舉結果。選舉的命運決定在密西根，賓州，俄亥俄州的小鎮，不是那些沿岸的移民居住地。的確，中西部的鑄帶區域經歷了自從

1990年代以來的移民人口的雙倍成長，移民不只在農業中有工作，也在工廠中有頭路。這些「外來人」的長相和文化可能讓他們成為了右翼政治人物的目標用來動員其選民的。對政客來說，把工作失去和經濟衰退的責任全推給移民是再容易不過的一見事情了，要去談全球資本主義和不平等的機制，還是算了吧。

所以移民權利的前景呢？答案是不明朗，除了我們知道州會變成移民運動的立即目標。加之提供了健保和駕照給無證移民，確保某種政治上的融合，城市宣佈為「保障移民」的城市，這就是一個對於川普政府的抵抗。

前方的路仍然險阻。川普控制了歐巴馬所調整過後的精緻移民遣返系統，而他的第一年繼續把移民和犯罪連結起來。其穆斯林的旅遊禁令重新點燃了把穆斯林和恐怖主義劃上等號的議題。其特赦了Joe Arpaio——一個亞利桑那州的警察違反了法院命令去居留移民，理由單單是因為那些移民是未獲核准的，這再一次說明了川普的「壞蛋」邏輯。以外，川普還試圖去終結DACA，這說明了在川普眼中即使是那些小孩、尚未犯罪也不可能對社會帶來危險的移民也是「壞蛋」。

而抗議是答案嗎？2006年有上萬名的移民權利運動者上街高喊「今天我們遊行，明天我們投票」和「移民權是人權」，十多年過去了，兩者沒有一個實現。沒有赦免的話，移民不會變成公民，而運動者訴求的「移民人權」或是希望美國人會把移民看成是全球市民的一分子，這樣子的論點在川普的民族主義時代顯然不適合。而且運動者擔心未來的亢議會帶來反撲：地方的反移民犯罪行為在2006年的抗議之後急劇升高。

移民改革是兩黨利用的馬前卒而已。要去讓家人重新團聚或是讓移民有機會可以實現美國夢是很值得的，而移民權利運動者也晝夜匪懈地努力朝這個目標邁進。沒有父母親應該和他們在美國出生的小孩分離，而且沒有人應該因為在邊界的另一編出生就被拒絕在保證安全、居住、機會之外，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要對美國移民法做出大刀闊斧的改革很可能是不會發生的，因為系統就是去執行其目的，當初設計的目的就是要提供我們的全球市場可以剝削的勞動力。沒有暫時的緩解，政策的小改變，或是短期的赦免可以改變這個巨大的動態結構。



川普威些要取消歐巴馬時代的行政命令DACA (兒童移民暫緩遣返法案)，這法案主要是針對無證的兒童移民，或稱「夢想者」。

註1：DACA (兒童移民暫緩遣返法案)，這法案主要歐巴馬的行政命令，是針對無證的兒童移民，或稱「夢想者」給予2年的可更新寬限期，並且可以有工作准許權。■

來信寄給G. Cristina Mora
<cmora@berkeley.edu>

> 川普對勞動的侵害

Ruth Milkman,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美國, ISA勞工運動研究委員會委員(RC44)



川普競選的時候成拉攏了工會成員，工會領導幹部開在川普後面一字排開。圖為川普和工會領導幹部。

美國勞動運動的訃聞早在川普當選總統之前就寫好了。幾十年來，工會率和罷工持續減少。這個趨勢當初在雷根當選之後快速增加，雷根對於鏽帶白人工人階級的民粹訴求早在川普當選的36年前就出現了。雷根比川普贏得了工會家庭的選票還多了一些(45% vs 43%)，不過大眾早已忘記了。

當然，勞工運動的瓦解已經大量減少了工會家庭投票者的分母，而2016年為止只有10.7%的美國勞工參加工會，其中6.4%來自私部門，這是從1950年代的35%高峰降了很多的。罷工率也從

>>

1980年代開始急遽下滑，而發生的罷工事件通常是企業試著要打壓工會迫使其接受更差的條件所導致。「工作權利」法（禁止私人企業必須僱用工會勞工）在2016年底擴展到27州，這是從1975年的20年成長而來，包括了前工會率很高的州像是密西根和威斯康新。這年2月，第28個州（密蘇里）也加入了，而就像每個人都知道的，去工會化和不平等的惡化是在過去40年一起進行著的。

當代組織勞工的可行場域是在公部門，而且工會率相當高，也相對穩定。但是在衰退之後，這個現象也開始改變了，在共和黨執政的州有一股立法的趨勢要限制公部門勞工的集體議價權利。最好的範例就是威司康辛，在1959年是第一個州立法公部門的集體議價權利。2011年其共和黨的州長Scott Walker推動了一個反轉這個的法案，儘管大規模的抗議產生，這個法案還是通過了，Walker很驕傲地簽署該法案。

而結果是很糟糕的，威州的公部門工會比例從2011年的50.3%降到2016年的22.7%。如同Gordon Lafer在他的書《The One Percent Solution》中說的，威州只是一個右翼系統性要去削弱美國公部門工會率的第一個戰場而已，不用說工會是民主黨候選人的政治資金主要來源。全國來說，公部門的工會率只有下降一些，從2008年的36.8%到2016年的34.4%。但是若更多的共和黨跟進威司康辛，這會有所變化。

在雷根的執政第一年終，白人工人階級被他暴力性地背叛了，他自己還是一位貿易工會主義者。雷根很出名的是他在一次1981年的罷工之後開除了上千名空中交通管制人員，那是一個對於美國勞工動衰退的一個歷史事件。該工會是支持雷根的。雷根對於罷工的無情回應還是戰後的首見。瓦解其工會是雷根時期的著名勞動事件，甚至短暫取消了聯邦對於工會人員的資料收集（這後來被恢復了，是由於企業的抗議）。

川普的競選不時提到「被忘記的男人」，召喚一個工人男子氣概的圖像，特別是他所在的房地產業的建築工人。同時，他也在其辦公室裡數落受過大學

教育的員工，而不是那些在工地的工人。川普對於白人工人階級的同情修辭以及反對由柯林頓代表的精英，代表那些「可憐的人」，複製了雷根的對於「雷根民主黨人」的訴求，甚至「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的口號都是學雷根的。

但是若川普的修辭有很大的迴響，其真正的勞工政策是比雷根的反工會要更不明顯的。而大眾被他的推特吸引了目光，或是其他像是白宮內部鬥爭的議題，其實實際上右翼已經悄悄地開始前進了，只是沒有被發現而已。川普政府開始消那些減少工作的管制政策，最有可能的是去取消一直擱置著的增加的工資門檻（1975年來沒動過），然後以超時工資的自動合格去取代之。此外，健保很少被看成勞動議題，不過川普要拿掉的歐巴馬健保的舉動是對白人工人階級有害的。

川普對於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NLRB）的五個提名人就非常的反工會，這和雷根時代是一樣的。兩個川普的提名人已經通過了，第三個將會在現職委員退休後到任，屆時川普勢力將會完全掌控該委員會，而在2018年，歐巴馬時代的對於工會友善的政策將會被反轉，川普原本提名的勞工部長是速食企業的老闆Andrew Puzder，後來被迫放切，但是那是因為他的家暴歷史以及僱用無證移民，並不是因為其反對勞工管制。

而對於美國工會最有影響的一個川普提名是大法官Neil Gorsuch，而所有的人都認為Gorsuch會在Janus v. AFSCME一案中有決定性的影響。該案是被伊利諾的一小群公部門員工所提出，受到了全國工作權利基金會和保守的自由正義中心所支持，威脅去取消由非會員的公部門集體議價合約所支付「公平分擔」或是「代理」費用，許多州的法律要求公部門工會去代表所又在其議價單位內的工人，不僅僅是那些會員而已。而公平分擔費用意思是去負擔那些代理和避免白吃白喝的情形發生。一些州（包括威斯康辛和愛荷華）已經禁止這個費用了。Janus將會延伸這個禁令到全國，這會對於公部門工會來說是很不好得消息，不論在民主黨或是共和黨的州都是

>>

如此。

然而，這樣的下重手會影響到全部的組織勞動的說法並不過時。現在，川普和工會的關係遵循著傳統「分而治之」的策略，並且這是一個種族和性別明顯分割的一條線。其就職的第一天就邀請的建築工會人士到白宮；然後他也會見了警察工會員工。這些勞動領袖代表了白人男性，其他還包括了川普討好邊境管控巡邏員工會。他宣佈反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還有其他的自由貿易，這些都是在工會中獲得迴響的，特別試製造業，雖然有人認為他宣稱有辦法把工作留在美國是「假新聞」。

然而如此友善的序曲是很明顯的缺乏的，特別是當我們討論到服務業和公部門工會、女性和有色人種的時候，更是如此。有時候也包括移工，而這群人

是川普的排外主義所針對的。川普的努力的把美國本土勞工一是多數人且都沒有加入工會一轉向敵視移工就是一個明顯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川普其實偏離了雷根主義，因為雷根主導了最後一次的主要移民改革(1986 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並且特赦了上百萬的無證移民。不過，川普除了這點不一樣之外，其工會的對策是和雷根令人膽寒的相似的。像是我們說的，歷史事件第一次發生是悲劇，第二次就是鬧劇。■

來信寄給 Ruth Milkman <rmmilkman@gmail.com>

> 美國的霧月？

Dylan Ri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國

拿破崙三世，法國的總統(1848-52)，馬克思筆下當資本階級失去領導權後的具魅力領袖，就像川普。



川普的勝選會帶來美國政治的徹底位移嗎？會，但是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樣。川普不是法西斯主義，而是一種「新

波旁主義」，用具有個人魅力的領導置換了霸權的計畫。就像是法國 19 世紀，川普的波旁主義被連結到霸權的危機，這是由於讓那些

>>

美國資產階級可以獲利的物質基礎開始縮水導致，同時宣稱要代表社會。這個危機有破碎和脆弱的政黨系統，伴隨前現代的國家制度和大眾政治冷感。任何適當的對於川普的政治回應必須處理讓他勝利得以可能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結構問題。

> 霸權和危機

從 1930 年代到 1970 年代，美國資本階級維持了一個福特主義的霸權，這是以高工資，健保，完全就業為基礎的。而長期的戰後成長讓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可以取信於工人階級。可是從 1973 年開始的美國經濟緩慢下來讓這改變了。對於企業精英來說，快速生產的成長和獲利讓福利國家的擴張得以被接受，可是來自德國、日本、亞洲四小龍、中國的競爭讓獲利率減少，遊戲規則改變了。政府和國家從 70 年代中期開始轉守為攻，並且快速調整。美國福利國家在卡特政府下重新起來，持續到歐巴馬時代。因的霸權公式是新自由主義，並且也保證了自由和自決，並透過市場和工人被重新想像為消費者得以可能。工資成長和社會福利前提之下，減稅被認為是共識的物質基礎。

新自由主義的危機可追溯到 2008 年 10 月 3 日，當時 7000 億的問題資產救助計劃 (TARP) 幫助紓困的銀行，揭露了市場經濟意識型態的偽善。新自由主義在歐巴馬時代持續，並且在環境和 LGBTQ 議題上讓步。不過歐巴馬政府業不能被看成是新自由主義。歐巴馬取得了金融資本和富有階級的支持遠勝過於布希，特別是歐巴馬健保法案讓保險業者得利許多。歐巴馬時代私人部

門和國家之間的關係重組了，資本家越來越仰賴國家。

川普有辦法有效地去把新自由主義的瓦解政治化。雖然他的經濟政策已經被許多專業意見所評論過了一紐約時報專欄也是諾貝爾得主 Paul Krugman 譴責川普的就職演說試圖去召喚「社會和經濟瓦解的反烏托邦，和美國現實社會不太有關係」，但是川普指出的問題卻是很真實的，1980 年時，製造業仍然提供 22% 的就業，並在密西西比以東、以北、以南上升到 30%，在南加州和太平洋西北，航空業增加許多。2015 年，製造業剩下 10%，影響了不僅僅是鏽帶的中西部，還有南部和西部州。去工業化有著負面的社會後果，像是貧窮、用藥等等。

當美國的製造業基礎被掏空而中位數薪資停滯的時候，經理人的報酬卻高得不得了。美國資本階級的利益因此是從整個社會中所擷取而來的，川普的選舉因此是統治階級的危機。美國社會精英不再有辦法可以生產讓大眾信服的論述。

> 2016：外卡選舉？

在一個意義上，2016 年的選舉是一個歷史外卡案例。但是有三個結構因素使其可能：政黨體制的掏空讓川普和桑德斯可以崛起，美國國家的前現代特徵，然後政治冷感。第一個很明顯，不用多說。而另外兩個也同樣重要。

美國國家的前現代制度特殊性在川普勝選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系統是設計去保護那些蓄奴者的寡頭統治。美國選舉系統和德意志帝國以及喬利蒂的義大利國

會很像：有限選舉權，多數決，選舉取得代價很高，國家的選舉人制度。川普贏得大選，卻輸掉了總票數接近 300 萬票。的確，美國政治體系的法國舊政權變形隨著都市化而更加明顯。

政治冷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只有 55% 的合格投票者投票，並且集中在有錢和受過教育的人手中。民主黨的投票者似乎比共和黨更不喜歡投票，按照一個調查，有 46% 的共和黨人投票，但是民主黨人只有 42%，有色人種更是佔了無投票者的大多數。若是有更多的民主黨人出來投票，那就會阻止川普當選。

> 共識消解

川普提出了什麼樣的解決方式？川普無法通過什麼法案，這似乎說明了高關稅和對於移民的控制可以擴大本地人就業和製造業，但是認為管制是美國經濟的主要限制這種說法是奇特的。

地緣政治的重新洗牌要開始了嗎？雖然無法開啟一種正常的美國外交政策（因為退出巴黎協定，拒斥人權和民主的原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日本將會一樣重要，而布希和歐巴馬發動的戰爭會繼續下去。

> 未來

政治抗爭的新圖像將會為何？國際關係中，川普計畫用「國家資本主義」、基礎建設刺激經濟，加上談判技巧，去施政。但是其計畫很不一致。美國赤字那麼多，要怎麼對抗中國？我們應該期待在宰制階級之間的強硬抗爭才是。

川普之所以不是法西斯是因為他缺少了黨的組織，軍隊，意識形態。其外交政

策是「孤立主義」而非擴張主義。Berlusconi 或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對比，但是這裡有兩個主要差異，首先，這位義大利巨賈比起川普要更屬於精英陣營，其有大的媒體帝國，並且可以直通政治精英階級，這是川普沒有的。更重要的，Berlusconi 的學習榜樣是雷根，以美國的方式去訴求義大利的需要，總之，Berlusconi 是個晚期新自由主義者，但是川普很顯然正在破壞之。普丁或是歐班或許是更有用的對比。從此觀點而言，川普可以被看成「新家長制」的人物，其聚集了一群追隨者並且用國家的規模去獎勵這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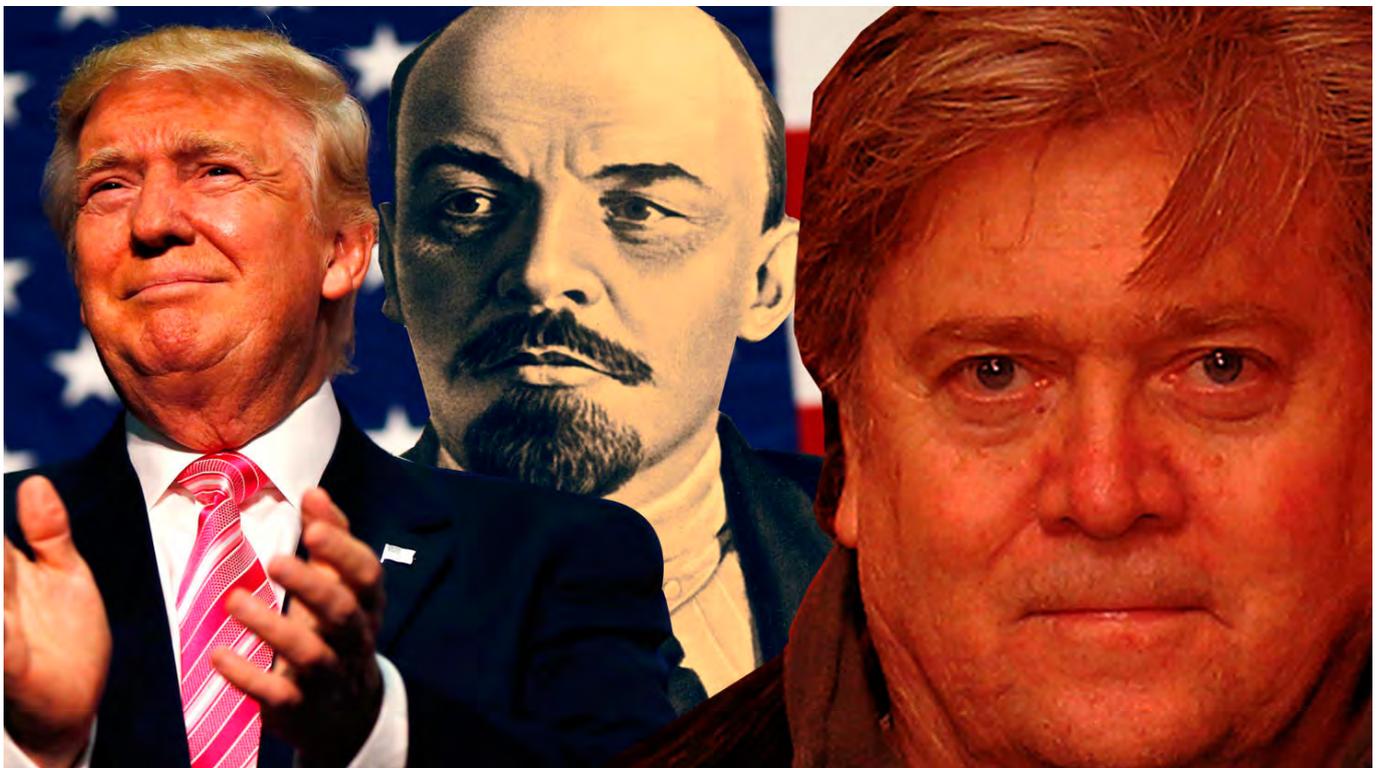
「川普凱因斯主義」經濟雖然令人懷疑，但是可以導引政府資源到中西部去鞏

固其選票的。但是透過這種國家資本主義要去發展美國經濟是不太可能的，我們可期待這種漂浮和衰退的持續。另一方面，川普勝選所體現的精英分裂或許會開啟美國的進步向左大轉彎的機會。■

來信寄給 Dylan Riley
<riley@berkeley.edu>

> 列寧右派的興起

Cihan Tuğa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美國



Steve Bannon是另類右派的知識分子，跟列寧一樣號召要推翻國家。

右派民粹主義的勝利在美國讓人相當驚訝。若將其脈絡化，放入世界歷史，這沒什麼好驚訝。簡言之，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循環已經到了極限了，經濟危機沒有轉譯成更廣的政治問題，但是意識形態對於各式集體主義的攻擊剝奪了中間和左派解決問題的人性。新自由主義的傳遞和持續的反集體主義是全球趨勢，我不會多探討這個議題。在美國，這已經惡化很

嚴重了，透過從左到右的民粹語言之歷史遷移和政治而發生。結果，左派不能民粹去挑戰右派，更不要說拯救或是推翻資本主義，而右派雖然不是解藥，但是卻可火力全開挑戰左派。

> 左派的自由化

左派不再可以用民粹的聲音發言，我不知道為什麼。無論如何，許多的左派意識形態者不想這麼做。為

>>

了了解為什麼，我們必須去看我們這個時代反民粹的歷史。

我追溯了這個消解，並矛盾地回到似乎是理論上最民主的運動：1968（西方的經驗）。此運動隨著反資本主義運動是一個反對史達林主義、社會民主、新政的國家主義和官僚制度的。雖然在某些方面是合理的，可是反官僚的心態讓許多人從國家退位和新自由主義勝利中學到錯誤的東西。1968是個必要的錯誤，右派從中復甦，但左派沒有。

兩個西方1968年主要的承襲者是自由左派和無政府主義。他們發展了不指對於組織、意識形態、領導的懷疑，還發展出了對於以人民的名義發言的懷疑。所以他們批評獨裁維權主義（極左）或是不負責任（自由左派）。除了南歐和拉美以外（左派民粹回來了，但是沒有階級、意識形態、組織的連結），右派佔據了浮現的鴻溝。

1968的自由至上精神點燃了新自由主義的反國家主義，但是在紙上被打敗。可是更遭的是左派的分裂，這分裂發生在後現代虛無主義和左派自由主義之間。

什麼是左派自由派的計畫？雖然有著來自全球的源頭和力道，左派自由主義發現了最純粹的表達方式得以在美國和英國實現。關鍵字是包容，取代了平等。被社會學家 Anthony Giddens 所啟發，英語世界的中心（新勞動黨和柯林頓主義）聚焦在納入更多的人近來。過去30年，包容意味著種族、性別、性傾向，但是空間減少了。雖然黑人、拉丁裔、女人、穆斯林等可以取得之前夢寐以求的職位，但是這些

人口也增加了，而被美國轟炸、禁運、剝奪食物的穆斯林也增加了。

左派自由派對於一般弱勢人民談的是福利政策，但是民主黨領袖不趕針對那些大咖，只好讓一般白人開刀，把他們排除在外。然後失落的白人被看成種族主義者，「可悲的人」，不可能說話的對象。

> 左派的自我毀滅和服務於右派

結果，弱勢沒有被動員和組織，也無法持續，就像去年總統大選的失蹤的黑人選票一樣。失落白人不信任兩黨，但是覺得自由派更可怕。直到桑德斯的興起前，左派精英（自由左派和進步派）被困在自由派精英發明的「多元」和「包容」的遊戲中。這些讓新政更不可能發生。

極左派了，儘管對於自由派左派有著很強的不滿意，許多激進知識分子運動者都慶祝了意識形態的終結，並且組織領袖，這導致了左派的「rhizomes」出現，以及進步民主黨人的選舉主義。從 Seattle 到佔領運動，美國左派盡力去削弱而非避免組織化的領導。一旦中樣瓦解，右派就更有能力回應。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右派放棄了意識形態和組織化領導。理論上，他們對抗兩者，但是只有在塑造意識型態、組織、領導進入範圍內的時候。

當左派埋葬了1968留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但是卻慶祝1968的自由和反文化精神），右派組織了反對1968的抗議，但是不像革命其他部份宣稱要去戰鬥，右

派是有組織也意識形態的，其成功了把主流導向極右，這就是我們長忽略的列寧說的革命理論。

> 美國右派的 21 世紀列寧主義

Steve Bannon—美國另類右派的知識分子—的解僱是一個錯誤的喘息。事實上，Bannon 的白宮旅程只是長征的一站而已，也就是要把革命民粹的語言、策略、謀略等從左邊移到右邊。他已經說過：「我是列寧主義者，列寧想要銷毀國家，而那也是我的目標。我要把一切都摧毀，並摧毀今日的政治精英。」但是這樣的列寧主義包括了些什麼？在複雜的民主中，列寧主義只能成為長期革命的一個民粹主義而。數十年來社會科學堅持美國沒有第三個政黨是因為制度而導致。這個「科學事實」已經讓自由派左派和無政府主義者（推翻新自由主義）更可以家自我肯定。而美國極右派已經推翻了這個「事實」，這好像他們按照21世紀簡明版的列寧的《怎麼辦？》，及開頭寫說：「若不能創黨，那就使其無法運作，或繞過，或是搶過來。」他們同時是做了全部的三種事情，我們可以想像該書所描述的還是一直持續，「在成為法律上領導之前，確定制度已經跛腳了。」若是茶黨沒有讓共和黨精英無法運作，那共和黨是有機會抵抗川的。」

美國右派民粹是一種民主條件下的列寧主義。不像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必須避免所有的表面的社會和政治，美國右派擁抱社會。修改後的《怎麼辦？》因此會說：「組織社會的每一個

>>

「我是列寧主義者，列寧想要推翻國家，那也是我的目標。我想要徹底摧毀當前的政治精英結構。」

Steve Bannon, 2014

元素，不要低估任何組織和政治的方式，甚至是（特別是）當它似乎屬於敵人陣營的時候。」右派學習到不能把教育、科學、文化讓左派整碗捧去。「挪用敵人的組織領域和意識形態去多展可能性，並拿掉那些無法挪用的。」從 Andrew Breitbart 他自己開始，作為另類右派媒體的創始人是閱讀法蘭克福學派的。其把健保看得重要，隨著川普和 Bannon 的興起，右派也保證工作和基礎建設。

今天，列寧主義右翼無法忽略其他可能的民粹力量，不論有多小都不可忽略。21 世紀的《怎麼辦？》將會有這樣的結語：「若有些敵人是在我們策略可及的範圍外，那麼要讓那些敵人退後去採取不成熟和不正當的行動。」當另類右派進到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和其他傳統左派陣營的時候，以及沒有基礎的極左派攻擊自由派的時候，自由派開始防衛自己（以言論自由為名）。自由派對於言論自由的熱情在另類右派在 Charlottesville 開卡車撞入一群反種族主義的示威群眾的時候，有點冷卻了。但是華盛頓郵報仍然在 2017 年 9 月的時候另類右派回到 Berkeley 時強調極左派的暴力和另類右派的自由。這一石數鳥的結果就是敵人分裂了，困惑，缺乏意志，弱點等都被暴露出來了，名聲掃地，而極右派更加集結了。

因為「國家」在今天已經比起 20 世紀的任何定義都來得複雜了，「粉碎」國家只能仰賴比 1917 年更不戲劇化的行動了。我們仍然不知道在制度無能為力的時候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但是我們將會很快就找到答

案。Steve Bannon 在去職之後像他的敵人「宣戰」，說要回去使用他擅長的「武器」（電子媒體），而民粹的革命要在自由主義的土地上（儘管慢慢衰退）展開是個艱難的戰役，而且會有反撲的力量。但是好戲才正要開始呢！■

來信寄給 Cihan Tuğal
<ctugal@berkeley.edu>

> 在巴西和南非的民主失序

Gay W. Seidma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美國, ISA勞工運動研究委員會委員(RC44)



南非總統Zuma，捲入金融醜聞。以及也捲入犯罪的Gupta兄弟。

從 川普的非預期勝選以來，許多討論圍繞在全球話的挑佔和威權民粹主意的威脅，但是這些討論都集中在富有的全球北方國家。那全球南方的新興民主情況如何？

過去 25 年來，巴西和南非是一個新時代的驕傲象徵：在威權工業化幾十年之後，兩個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國家開始建立民主憲政的社會，有著人民選舉出來的總統，並且在包容的社會政策和經濟成長和全球化之間找到了平衡。

在兩國中人民的運動在 1990 年代結合了公民社會、勞工運動、窮人，變成了後殖民的一個全球象徵。兩國的政黨都在執政後致力於進步的改革，平衡經濟成長和民主權利。

兩個國家都是礦產的輸出國，並且都在 2000 年代因為價格而獲利。受歡迎的政黨似乎找到了務實的平衡策略，讓外國的投資和地方的人民都開心，維持全球的連結同時制定讓窮人受惠的社會政策。

但是今天的南非的非洲民族議會和巴西的工人黨都陷入混亂狀態，分裂，因為被控訴貪污，失去民心。兩個國的貪腐醜聞讓政黨已經非常難堪，大型私人企業會落政黨和政客，為

的是贏得大的營造計畫合約，補主，公共合約，造成了大眾的憤怒和不滿。

貪腐在今天的社會很難說是新的事情，這想當然爾。在兩個國家中，威權主義的工業化是精英所推動的歷史結果，壓迫的政府連結到主要的企業，企業需要政府的幫忙和國家提供的合約。

但是民主也開啟了新的透明性，就是民主的制度和媒體已經揭露了那些過去不見天日的案件。在兩國中，獨立的檢調單位也開啟新的民主結構，連同對於言論自由的新保護，這些揭露了貪污案件的許多細節。民主國家中的政治人物和政府機構是可以被司法調查的。

在巴西，工人黨給了獨立檢察官新的權力，讓政府調查員讓證人可以有較輕的刑期去換取證據。這個改變讓檢察官可以去調查 Lava Jato 醜聞，使用錄音證據去起訴。南非也成立了新的獨立檢查單位，是透過國會任命，於後種族隔離時代成立。2016 年後其，「公共檢察官」是一個憲法賦予的質外，揭出了一連串的貪污案件，這些都是在國家和私人公司之間的醜聞。從那時候開始，大量的電子郵件外流就給了獨立的新聞媒體有更多的證據去報導相關

案件，讓大眾得以知道政府和私人企業之間的暗盤交易。

不令人意外的是，這樣的揭露已經造成群情激憤。在兩國，大規模的街頭抗議是被反對黨所支持的，特別是因為商品化已經讓兩國都進入了經濟衰退期。重要的是，關注窮人的政策是透過稅收支持的，但這不是富人的稅。所以當衰退開始的時候，都市中產階級憤怒了，在接上或是社群媒體上都是如此。

幻滅也上政治進入混亂狀態，曾經受歡迎的政治人物變得顏面無光，並且沒有明顯的替代方案。巴西的右派媒體支持保守派政治人物，透過「柔性政變」達成，像是前總統 Dilma Rousseff 被彈劾，並不是因為個人貪污，而是她允許會計操弄讓社會支持在經濟衰退時得以持續。

巴西的保守政治人物很快地就去鞏固自己的權力。現任總統 Michel Temer 已經在影像證據中被發現收賄，現金裝在皮箱內，但是 Temer 可以透過模糊的法律手段繼續執政，議會支持 Temer，拒絕提早大選，這再次確定了巴西統治精英的共謀。

對於巴西的窮人家來說，這個政府的改變意味著日常生活的真正變化以及機會的變化。Temer 的未受選舉選出的內閣已經取消掉了許多巴西關照窮人的政策，削減福利和服務，取消勞動法律，減少社會支出。

該醜聞已經讓巴西曾經令人敬佩的工人黨陷入一片混亂，前總統 Lula 也是該黨的最受歡迎的人物已經被判處 10 年貪污罪（他最近提起上訴中），該黨的基礎一包括了巴西的勞工運動一也因此幻滅且潰散。

南非的政治動態指出了巴西失序的驚人相似性。當國家以商品化為基礎的經濟衰退時，中產與上層階級的納稅人會對於亂花的政府資金相當氣憤，而現在的民族議會領袖也捲入醜聞，差一點在最近的不信任投票中被拉下，即使其擁有國會多數。

南非總統 Jacob Zuma 的個人貪腐是被紀錄下來的：政府上百萬的資金用於總統個人的資產，現有案件和電子郵件的揭露也指出了 Zuma 的家庭和親信都非法取得了政府的合約，包括了 Gupta 集團，這是一間已經被和非法吸取政府資金劃上等號的公司。

重要的是，政治人物並不是唯一的壞行動者。在巴西，就像許多的石油公司一樣，建商和農業大企業都被查到賄絡的情形，那通常是用來交換政府的合約。南非的許多白人擁有的企業（以及德國、中國、英國的跨國企業）也被發現類似的情形。

最近的揭露已經讓公眾的焦點轉性那些為全球會計和法律事務所工作的專業者：有執照的會計和律師已經讓那些腐敗的交易成為可接



巴西的主要政黨都捲入了貪腐，包括了Temer 總統和受歡迎的Lula 前總統。

受的，有時還幫忙洗白。即使公共關係的公司也是共謀之一，一個英國的大型公關公司 Bell Pottinger 代表 Gupta 集團去協調運作惡意的社會媒體選戰，試圖把那些 Zuma 的批評者都貼上「白人壟斷資本家」的標籤。

當然，脈絡和歷史是重要的，當巴西的右翼政治人物已經開始把民主政府的改革成果一一削減時，南非的黑人多數民眾不會允許政治回到種族隔離了白人至上種族主義。在巴西，民主政府締造了真實的進步，改善窮人生活，提供電力，水，資金，福利。

可是若是巴西的工人黨失去了中產階級的支持者，然而南非的黑人還是對於民族議會去擴張其社會補助政策感到同情的。兩個國家都有著種族隔離的歷史，但是南非的白人種族主義正色仍然陰魂不散，政治忠誠也反應了長期對抗種族隔離的抗爭。此外，許多中產階級的南非黑人仍然被排除在白人主導的私人部門的上層之外，只好從事教師，護士，警察，官僚、或是政治人物，這在民族議會上台後更是如此，並且形成一種效忠的意義。

然而，對於民族議會的忠誠或許正在弱化，特別是在都市地區，那些年輕選民表達了對於高失業率的不滿，不適合的社會服務，以及持續的種族化的經濟和機會不平等。一位有魅力但是腐敗的前民族議會年輕領袖已經吸引了許多年輕投票者到他的新政黨：經濟自由鬥士 (EFF)，但是提供的是相當模糊的承諾。若是 Zuma 仍然在位，民族議會可能會在下次選舉丟掉國會多數，而且經濟自由鬥士可能會取得上風。

接下來呢？兩國的反民主浪潮的威脅是相當真實的，並且川普的勝選讓這種威脅更加可怕？從 1990 年代早期，巴西和南非的人民本來可以依靠有力的盟國，特別是美國，去支持和保護脆弱的民主。但是在川普政府之下，白宮對於相關議題的沉默惡化了這樣的全球趨勢，而民主可能繼續深化下去嗎？巴西即使沒有軍事干政，可是現在的政府還是要把之前的社會公民權利取消，而南非雖然很難看到白人至上種族主義，但是威權民粹的威脅也很真實。■

來信寄給 Gay Seidman <gseidman@wisc.edu>

> 仔細檢視阿根廷

Juan Ignacio Piovan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Plata, 阿根廷, ISA未來研究委員會(RC07) 和邏輯與方法研究委員會委員(RC33)



CODESOC的行政幹部和PISAC的執行長Juan Piovani於2017年在科技部會面討論該機構的未來。科技部攝影。

在 阿根廷科學社群很熱切地歡迎了新成立的科技部部長 Lino Baraño 給出他的第一個深度訪談。他接受了報紙 *Página 12* 的訪問，描述社會科學如何幫助改善國家經濟，並描述其支持軟體發展、生物科技、奈米科技的計畫，被問到有關社會科學時，部長認為應該納入，但是當他比較社會科學和其他科學的時候，他堅持只有一個方法的大轉變才會讓社會科學真正成為科學。

不用說，Baraño 的說讓社會科學家感到相當不是滋味，而社會與人文社會科院長委員會 (CODESOC) 也立刻要部長澄清，他們要的是解釋，而且更像是一種道歉。同時，他們也希望可以面對面會談，解釋社會科學如何可以貢獻給社會。

最重要的是，部長同意出席 CODESOC 的 2009 年會議，並且宣佈他會大支持和資助社會科學的計畫。這是阿根廷的阿根廷了國家當代社會研究機構 (PISAC) 的濫觴，並且在 2012 開始於 CODESOC 下面執行，其包括了 50 個公共大學的社會科學系所，並且由科技部和高等教育政策院 (SPU) 所

資助。

設計 PISAC 有著很大的挑戰。很快地我們就發現單一計畫不可能滿足這個寬廣的科學需求，所以，一個研究機構是比較適合的，於是我們把老中青的社會科學家都找來一起激盪想法。

從 PISAC 的早期時代我們很清楚說計畫並沒有野心，只是要奠基在阿根廷社會科學的豐富傳統上，因為阿根廷社會科學從 1983 年民主轉型之後就開始擴張和鞏固，但是我們也承認有各種缺點，像是分裂，區域與制度的不平等，試圖要「都會化」研究主題和社會現象的解釋，傳播社會學知識的困難（學院內與外），社會科學發現仍然很難被注意到，特別是那些關於「邊陲」地帶的研究成果。

這個對於阿根廷社會科學的批判性評估最後帶領了我們定義三條研究軸線，包括了超過 10 的計畫。當然，主要的目標是生產一個整全的當代社會的解釋，並從跨學科的角度，兼具理論和經驗。但是我們也利用這個機會去檢視制度和科學的條件如何影響社會科學知識的生產，並系統性的整合既有的研究。

有趣的是，這樣的架構似乎也符合 Burawoy 的社會學四種類形：批判、專業、政策、公共。PISAC 和批判社會學有關是因為其試著檢視社會學科學在阿根廷如何被執行，去揭開其理論和認識論的基礎，以及和霸權知識生產體系的關係。PISAC 也是一種專業社會學，因為其處理經建的問題，並且使用被接受方法，出版研究成果給學術界的人士。同時 PISAC 也是希望去超越學術界，許多的研究問題都反應的政策的需要，並且和公共與社會團體一起合作去生產專家知識，影響社會政策。最後，PISAC 也介入公共辯論，挑戰一般常

識性對於社會的理解，並且批判那些媒體再生產的刻板印象。

因為我們也關心知識生產的條件，所以把目光轉向國家的社會科學系統，聚焦在科學與教育制度的地理分佈，研究者的學術軌跡，研究議程，出版。[Fernanda Beigel](#) 的本期文章反應了這樣的計畫是如何分析不同的知識生產與傳播形式的差異，強調了在服從國際規範的研究者和本地規範的研究者之間的差異。

關於過去研究結果的系統化，我們決定聚焦在 6 個廣泛的主題：社會的主題：生活處境、國家政府與公共管理、公民與社會動員和衝突、社會和文化多元、社會消費和實踐。每個主題都是被多重制度的團隊所負責，並且分析相關的期刊，生產出一種文獻回顧。這些報告現在可公開取得，只要去 CLACSO 的虛擬圖書館就可以找到 (www.clacso.org.ar/libreria-latinoamericana)，也可以到 PISAC 的網站 (<http://pisac.mincyt.gob.ar>)。[Alejandro Grimson](#) 的本期文章也呈現了研究成果如何挑戰了官方對於阿根廷的同質性社會文化解釋。社會科學可以生產更精確的多元文化解釋，並讓社會弱勢的能動性被看見。

最後，為了去讓當代阿根廷的社會分析更加先進，我們決定去執行三個全國調查，包括了 339 個鄉鎮和超過 2000 名居民的民族誌。

最後，為了生產出當代阿根廷更完整的解釋，我們決定執行三個全國性調查，田野範圍包括了 339 的城鎮，這些城鎮都超過 2000 名居民。其一著重在社會結構和生活處境，其二處理了社會關係，然後第三個則探討價值、態度、再現。我們選擇這個方法的理由有幾個。首先，既有研究經費已經首先給小型的研究，遍佈各個團體，這讓大型研究計畫難以發展。再者，一面到地傾向質化研究意味著社會科學家其實放棄了量化和結構研究。因為經費不多的質化研究已經研究了非常有限的社會環境，通常是在都市，現有對於阿根廷社會的描述總是忽略了明顯的異質性問題。

在這期的《全球對話》中，[Agustín Salvia](#) 和 [Berenice Rubio](#) 討論了第一個調查，

強調阿根廷不平等和社會流動的結構，以及特別社會群體的處境。[Gabriel Kessler](#) 討論了調查的理性和科學的目標，為的是去研究社會關係，包括的議題有社會資本，社會性，自我認同，社會障礙，衝突社會關係，參與與集體行動，這些都是在全國的層次上進行的。

既然 PISAC 的結果已經開始發表了，阿根廷的社會科學面臨了新的挑戰。另一方面，我們已經在轉向新自由主義的政治之中了，就像許多其他國家一樣，這已經讓研究經費刪減許多，目前為止，新的政府已經表示支持 PISAC 的計畫，而且已經提供資金，不過還是會擔心是否 PISAC 可以在科技部中被制度化，以及該部門是否繼續支持大規模的社會研究。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見證的後事實論述的興起，特別是社會媒體，因為他們通常貶低社會科學為意識形態的，所以不應該得到公共資金。類似地，高階的政府官員也重複地說是支持「應用」的研究和「有用」、「工具性」的知識

然而，PISAC 的初步結果從社會和制度上廣泛的光譜中得到很強烈的支持，包括了社會科學家，大學，公共組織，社會運動，記者，政治人物，政策制定者。儘管那些反作用力，其結果收到了熱情歡迎讓我們有理由去對阿根廷的社會研究的未來保持樂觀。■

來信寄給 Juan Ignacio Piovani

<juan.piovani@presi.unlp.edu.ar>

> 勾勒阿根廷社會科學的輪廓

Fernanda Beigel, National University of Cuyo, 阿根廷, ISA社會學歷史研究委員會委員(RC08)



Buenos Aires的科技部和國家科技研究委員會。Juan Ignacio Piovani攝影。

過去40年來，科學的地理結構已經從新形塑，這是透過出版系統建立了「普遍」的語言和寫作格式，並且透過主流圈子建立了少數學科的優越性和核心，忽略邊陲的社群，把一些期刊排除在科學資訊機構的名單之外 (ISI，現在是科睿唯安科學分析網站公司)

然而，有越來越多人註要到了主流之外的學術網絡，包括了開放使用運動，區域出版社群，像是拉美科學出版。從1960年代開始，拉美社會科學歷經了名聲建立的「區域化」，透過區域中心的建立，以及科學政策的「國家化」。

在跨國社群之外，地方的學術社群也包括了許多排名之外的期刊，這些期刊的流通有限，但是反應了非跨國學術空間的持

續性。這些邊陲的科學社群的動態為何。我認為這些不同的學術場域開啟了極化的空間，導致了學術精英的「兩面性」，一面是往外看，一面往內看。

越來越多的學術出版和評量之間的緊密連結產生了一種多元的正當化原則，以及不同的肯認場域（都是有效的，但是伴隨不同的獎勵），並且跨越了國家邊界。

學術社群的破碎化以及其對邊陲社會科學家的影響不是僅僅是英文霸權的結果而已，這些場域也被相互競爭的文化和結構不對稱而導致，這有三重的階層化原則，以出版語言，機構，學科為基礎，形塑了學術的不平等。

阿根廷是一個有趣的案例，可以用來分析出版和流通的形式。最近幾年已經有越

來越多的資金，越來越穩定的各種博士學位，還有可見的「民族國家」的對於阿根廷學術架構和研究的強調，全職的研究者在過去10年成長三倍，從2003年的3,694增加到了2015年的9,236人，然而這段期間在阿根廷的主流處版形式的學術和地方性的學術差異也增加了。

出版排名指標定義了不同的獎勵形式。在國家級的研究機構 CONICET 中，國際期刊的出版或是 ISI 以及 Scopus 的排名期刊都受到很大的重視。但是 CONICET 的社會人文科學和農業科學系所是重視地方期刊的和被收錄在 SciELO 或是 Latindex 裡面刊。評量的文化則是對質量和原創性的強調轉向了評比排名、影響係數，或是 h 指表，所有的這些指標都是可以辯論的。

在國家、地方、非排名的期刊出版被認為是那些非都會地區大學的研究人員的途徑。阿根廷的教育系統有著大學自主和政治化的傳統，地方肯認場域仍然很動態，數以百記的地方期刊仍然用紙本，而地方學者用不同於國際的標準去發表。這些文章的質量不好嗎？因為這尚未被研究，我們無法下定論，但是地方發表在地方很常見，特別是社會科學。

隨著這些多重(甚至相反)的評量架構，阿根廷社會科學家若要追求地區或是國際的路徑，那是相當不同的(一個在 CONICET，一個在國立大學)，這也關聯到50所國立大學的升遷管道的差異。

> 生涯最佳的出版前五項

CONICET 的社會科學者之中，若是國際標準是主流，那期出版的特徵為何？我們檢視了4,842人的樣本(7,906為總數)，其申請升等或是被問到列出生涯最好出版前五項。這包括了超過半數的 CONICET 研究者，並且在學科、年齡、階層有所平衡，涵蓋了助教授，專案教授、獨立、主要、傑出教授等，該機構接受每年一次的申請，並且是自願性的。

重要的是，申請者選擇了5個生涯最好的出版，這是以他們自己認為最可以讓評鑑小組印象深刻的。因此，其選擇提供了我們可以探討評鑑表準的機會。許多的案例中，特別是人文社會，這些選擇並不代表其履歷上的其他出版。

處版的資料庫包括了23,852個項目，包括標題、類型(書、章節、文章、會議論文、

技術報告)，還有語言最佳出版前五項的語言很同質，應於佔了4.2/5，其中男性是4.13而女性是3.91。年長(65-85歲)的平均值稍微低了點，但是差別很小，顯示了英文寫作可回到好幾十年前，關於語言，以區域而分的資料也顯示了出版的英文多數文章是在「硬」科學領域(4.77)，而社會人文研究者則是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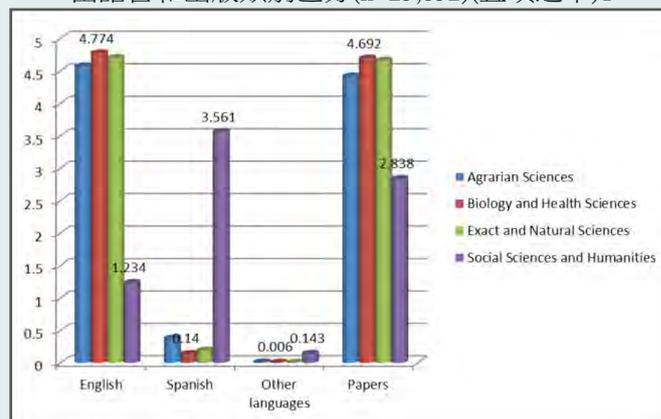
這個出版類型反應了更多的變異，因為書籍和書籍章節在年長研究者中更普遍，在年輕學者中(31-44歲)，5人有4.4人的生涯最好出版是文章，代表「論文」變成了越來越主流。而文章的平均數對於社會人文研究者而言是2.8/5。不幸地，尚未有對於書籍主版的地方或全國研究。

有趣的是，多數的在國立大學或是 CONICET 附屬中心的941名人文社會學者是和其他國立大學學合作的(像是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UBA))。以教育背景而言，33.7%在UBA取得博士，稍微高過平均值，而43.5%也從UBA取得碩士，超出平均值很多。性別方面，56%的人文社會學者是女性，而平均來說1.14/5的生涯最好出版是英文。對男性而言，1.35/5的出版是英文。若比較「女性」的學科，語言的變異很大，所以性別不是決定因素。因此，例如文學的出版多數是西班牙文，而心理學多數的英文。

我們可以從這個生涯最好出版的流動中學到什麼？可以在圖2中看到，83%出版在主流場域中傳播，而其他17%則是在主流場域之外，人文社會學者佔76%，或是國際會議發表的論文佔24%。

CONICET 的社會科學家符合了一種以排名為基礎的評鑑架構的圖像。雖然這個領域呈現了在主流場域較少的出版數量，

生涯最佳的出版前五項，由2015年的領域區分平均，由語言和出版類別區分(n=23,852)(五項之中)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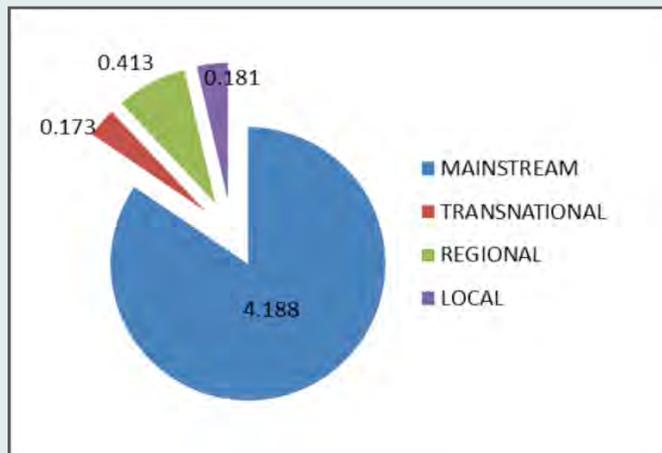
但是區域的排名優先選擇是很明顯的。SciELO、Latindex、跨國的 DOAJ 和 Dialnet 是許多人文社會學者的選擇。7% 的阿根廷出版是列入排名的，而多數是社會人文期刊。主流的趨勢是要發表到 Latindex 的西班牙或是葡萄牙文期刊。

在他們的履歷裡面，多數社會人文學者有更多的地區出版，但是名聲的分佈在阿根廷的學術界是複雜的過程，伴隨著現有和多重的正當化原則，以及肯認的場域。

註1：這兩章圖可以在以下的文章中找到：Beigel, F. (2010) 《全球對話》〈Social Sciences in Chile (1957-1973) : A laboratory for an autonomous process of academia-building〉, 收錄於 Alatas 與 Sinha-Kerkhoff 編輯的《Academic Dependenc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tructural Reality and Intellectual Challenges. New Delhi: Manohar》, 頁 183-212, 以及 Beigel, F. (2016) 〈Peripheral Scientists, between Ariel and Caliban. Institutional Capital and Circuits of Recognition in Argentina. The ‘career-best publications’ of the researchers at CONICET〉, 於 Dados 59(4): 215-255。

來信寄給 Fernanda Beigel
<mfbeigel@mendoza-conicet.gob.ar>

平均生涯最佳的出版前五項，由2015年的社群區分(n=7,071)



> 阿根廷的社會和文化多元性

Alejandro Grims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an Martin, 阿根廷



在Buenos Aires的同志大遊行中玻利維亞移民慶祝多元並且抗議針對移民的種族主義。
Federico Caruso攝影。

每個國家都是在社會和文化上異質的，並且是多過於自身的想像的，不過阿根廷或許是個極端的案例。多數阿根廷人認為巴西有更多的原住民，可事實上，按照 2010 年人口普查，巴西人包括了 850,000 自我認同為原住民的人，阿根廷則有 950,000，在巴西的比例是 0.4%，而阿根廷是 2.4%。

在阿根廷，國家以經建構了一個南美歐洲社會的自我圖像，好像整個國家都是 Buenos Aires。但是最近幾十年來，這個圖像已經陷入危機。原住民運動，新普世主義，國家的衰弱，逐漸對異質性的接受，這些都伴隨著那些挑戰國家的典型想像，像是歐洲、白人、地理中心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但是研究者已經避免把多元性塞到全球的自由主義多元文化的模型之中。

> 傳統的解釋：歐洲主義和熔爐

把阿根廷描述成熔爐的論述從起源於國家的民族主義計畫的。針對這點，阿根廷「和大船脫勾」（西班牙、義大利、波蘭等），這是一個囿限於並且自然化了普遍的歐中白人特質。這也是被明顯的原住民和非裔人口的缺席而支持的，因為該國的主導群體是中間派和「porteño」（Buenos Aires 居民）。

像是在巴西，阿根廷的預設的熔爐是沒有納入原住民和非裔阿根廷人的，但是「種族」是從歐洲民族主義而來的。自從 19 世紀以來，阿根廷試圖要開啟一個「文明」的國家，倡導

>>

移民和經濟成長，並發展公共教育。這個計畫有賴於去預設歐洲移民會支持了本土人口的文化慣習，而這卻是一個發展的障礙。

政府的壓力去建構一個族群的國家、同質的文化，社會包容，這意味著每個變化或是特殊性都是負面的，或是直接視而不見。只要同質性計畫成功，皆急救變成了政治的禁止話題，被制度強烈反對。

因此阿根廷發展兩個完全不同的「平等」的意義，並且是在這個協議上為基礎的。去避免族群差異的不可見性，避免文化同質性，然後這成為取得公民身份的條件。

透過這個協議，每一位阿根廷人可以加入精英或是都市中產階級，然後「漂白」。每個人可以最終逃過免於受歧視的命運。可是在排除工人群體、大眾，並視之為窮人，「negros」，野人，或是「內部移民」，特別是當他們參加政治的時候把他們排除在外。然後相反地是文明，阿根廷的，白的，歐洲的，受過教育的。

大約 56% 的人口有著原住民的血統，雖然這不意味著他們有原住民的認同。阿根廷長期拒絕異族通婚，但是社會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包括原住民，地緣，宗教，語言等，而且阿根廷的政治歷史也根源於標準化和排除。

阿根廷的文明化模式是二元的，而且二分的社會自我形象也仍然很強，以至於繼續成為國家的「心靈的習慣」，包括了政治。白或黑，文明或野蠻，首都或地方省，裴隆（支持裴隆黨的人）或是反裴隆。

► 種族主義和階級主義

阿根廷是一個「沒有種族主義者的種族主義」國家，按照古老的迷思：「在阿根廷沒有種族主義，因為沒有『negros』的存在」。雖然很少人是屬於非洲裔，「negro」或是「negro de alma」（黑靈魂）通常被用來指向窮人，住在貧民窟的人，工會工人，街頭抗議者，Boca Juniors 足球隊的粉絲，或是裴隆主義黨人。

然而，沒有一個政黨透過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而得到多數選票。阿根廷並不都是種族主義的，也不是所有的種族主義態度都是一樣的。針對移民的種族主義，針對深色皮膚的移民（“el interior”），針對非裔移民（特別是從塞內加爾來的），以及和針對亞洲移民的種族主義，都是不一樣的。此外，種族主義通常和階級交錯，像是「negro」被當作「窮」的同義詞。

社會研究顯示了即使種族主義和階級主義在白人為主的高級生活品質地區是普遍的，這些意識形態也被整合到了大眾階級的語言之中。更糟的是，「negro」一詞也在每天的生活中可聽見，用來表示親密性和情感，特別是在

朋友、小孩、父母、夫妻之間。「Che, negro」是一種愛的表達方式，主要用於非正式的親密朋友談話中。

► 地區，語言，宗教的異質性

阿根廷社會深深地在信仰、實踐、儀式、認同上面是異質的。然而，若認為有一個主導的阿根廷文化，那不僅是忽略了不同地區和省分的差別，也輕視了社會文化的生產，美學或是科學的都是，因為這都質疑了同質性的存在。

阿根廷的自我認同是以很強烈的以西班牙語和天主教為基礎的。然而現實上卻更複雜。原主民的語言像是 Kichwa 和 Guaraní 在一些省份是通的，中文和韓文則透過移民而在 1980 年得以被看見，然後由於西班牙和義大利的移民增加，也上西班牙語成為通用語言，

但是會有不同的用字、俗語、語調等，宗教多元也是很複雜的。雖然許多原主民經歷改宗到基督宗教，一些原主民信仰繼續形塑了認同，而許多阿根廷人今天也信仰猶太教，各種新教，非洲巴西宗教，伊斯蘭，佛教，唯靈論等。

► 阿根廷的社會文化多元性與未來

除非阿根廷開始給予國家的多元性更多的關注，不然像是許多國家都會經歷的階段，並且在阿根廷似乎是循環性的，那就是歧視移民。這種歧視把差異看成道德上的、名聲、權利上的差序。而已十年來被預設成只有 Buenos Aires 的人有正確的發音，而其他人被認為則是落後的。

今天，作為一個移民國家，阿根廷歡迎「新移民」來工作，但是拒絕與其在日常生活中互動。這些「新移民」其實並不「新」，針對這些人的歧視通常是那些鄰近國家來的人，像是玻利維亞，巴拉圭等，其數量從 1869 年來就很穩定，根據人口調查，數量從來沒有少於 2%，但也從沒超過 3.1%，而阿根廷的移民小孩也通常被認為是玻利維亞人，這是一個常見的稱呼，指的是從西北來的人或甚至是窮人。

這個現象自從 1990 年代快速地擴張，失業率上升到 15% 的時候，以及然後的 32%。這個有關移民的概念是認為移民會偷走工作，並且在許多社會相當普遍。但是，阿根廷是非典型的，2002 年的經濟危機很快地減少了排外主義，而且事實上 2004 年有法律延伸了移民的權利，研究指出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和階級主義持續中，產生了社會的種族主義，但是沒有政治上的排外主義。

然而，每次衰退的時候失業率傷生，歧視性的言論就會在公共領域中就揮發生影響力，

►►

只要多元性會讓阿根廷的重統自我歐洲人認同產生動搖，但是沒法將其取代成更民主、包容、跨文化的觀點，那種族和階級的不正義將會持續下去。■

來信寄給 Alejandro Grimson
<alegrimson@gmail.com>

> 當代阿根廷的 社會不平等

Agustín Salvia和Berenice Rubio, 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 阿根廷



Buenos Aires的貧窮和富裕的居住區。Juan Ignacio Piovani攝影。

多數的拉美社會被認為低度發展和非常不平等。在 20 世紀中，阿根廷社會似乎呈現了相反的圖像：高都市化、高度就業、全民健保、教育、工業化、中產階級的興起，不平等不嚴重，且有高度的社會流動。

但是社會變化了很多，進步的成果也退步了不少，特別是在 20 世紀尾聲，新自由

>>

主義的結構變化導致阿根廷社會無法避免失業的衝擊，經濟自由化，貿易開放，金融化的彈性導致了不穩定，失業，貧窮，社會排除，使公共健康惡化，教育降低，社會保護消失。

這些過程產生了一個高度不平等、衝突、不穩定的社會，這是一個經濟、社會、政治危機的惡性循環，於 2001-2002 年開始，是阿根廷當代歷史的最低點。

相反地，21 世紀的前 10 年因為由於國際脈絡的影響證明了經濟、職業、社會、政治、制度的恢復是有可能的，但是這個期間並不持續很久，經濟再度放緩，社會結構的分裂也愈來愈明顯，2015 年阿根廷社會有了許多的貧窮、邊緣化、排除的群體，大約 30% 的人口是貧窮人口，6% 處於極端貧窮之中，無法取得食物。這也因為都市邊緣化效應而惡化，35% 的家庭沒有排水道，20% 沒有水，15% 住家很危險。

為了回應這樣貧窮的處境，不同的論述在拒絕、沙文主義、犧牲者的論述間搖擺。我們太長看到好像阿根廷社會是同質、一致、整合、公平的社會的論述，這樣的刻板印象是被國家的民族建構過程中所建構，並且被中產階級所強化。但是許多其他的人相信自己是活在最貧窮的國家，有著最糟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

這些矛盾的圖像—有著光榮的過去和現在—在媒體和政治論述中充斥著，這個脈絡下，阿根廷社會結構調查 (ENES)，這是一個國家研究機構 PISAC 主要計畫之一，為了探討兩個相關的過程，社會不平等的結構，以及邊緣團體的生活處境。阿根廷缺少了可信賴的社會統計和整全的結構分析，ENES 已經有了很大的貢獻，收集資料和研究想是階層化、社會流動、居住、生活處境、再生產社會策略等，跨越不同的地區和群體。同樣重要的還包括建構一個經驗研究為主的社會解釋，挑戰刻板印象和迷思。

事實上，資料顯示了阿根廷的現有社會結構是異質的，不平等的，分裂的，頂端的政治和經濟精英組成了傳統家庭和新布爾喬亞，代表了少於 3% 的人口，再來是上層中產階級，包括了企業經理、專業人士、生意人、農業生產者、中小企業，還有技術勞工。這些人和精英涵蓋了三分之一的人口，並且整合到西方文化之中，有好的教育和生活品質、消費，就像南歐的中產階級一樣。許多這些人都在 Buenos Aires 市

中心和郊區，以及中 Pampas 的主要城市，或是地方首都的高級區域。

再來，另外 33% 的人口組成了中產或是中低階級，這是一個由中產和中低階級組成的群體，包括小企業雇主、工人等，半技術勞工，退休人員，獨立專業者等。雖然他們的收入在貧窮線之上，且多少工作穩定，這個群體多半沒有社會流動性，而且這些人面對經濟衰退和技術變遷的時候最容易受到影響。因為公共服務品質下降，中低階級的人通常使用私人交通工具、健保、教育，為的是改善生活，但是通常沒有用。

最後，在金字塔的底端，33% 的阿根廷人組成這個群體，包括了貧窮的前中產階級，新貧，被排除的人。總體而言，這個階層包括了自僱工人，非正式工人，農人，小農等，來自邊陲地帶，他們的收入總是從不穩定和臨時的工作而來，或是社會補助而來，這些人是主義的低品質公共服務、基礎建設、公共教育、健保的使用者，他們活在貧脊的鄉下，或是在集體的公共住宅，位於阿根廷的東北和西北。

在最後一個群體之中，許多家庭經歷了嚴重的剝奪，基礎建設的缺乏，以及環境風險。此外，失業率 (9%) 和非正式工作 (30%) 都屬於這個群體，這個群體包括了 45% 的尚未完成高中學業的年輕人，也包括了 15% 的童工和 8% 的兒童，他們受到了嚴重的食物風險。還有，這些家庭的女性也受害於經濟、社會、文化的排除，通常因為家庭因素或是非正式勞動參與而輟學。

跨領域的研究團隊政策分析由 ENES 收集的資料，整合出一個阿根廷社會最完整的解釋。當這些分析完成後，他們將會呈現社會的不平等和異質性，彰顯了阿根廷貧窮的廣泛不同經驗圖像。研究成果也挑戰了既有主導的新自由主義論述，那是在阿國和地區相當普遍的論述，歧視圖把社會成就描述成是個體的努力成果，並把貧窮歸咎給個人的失敗所導致。透析社會生活處境和不平衡的機會，我們的資料顯示了不平等形式如何交織，集中在某些地區和群體。

使用來自人口超過 2,000 人的 339 城鎮，超過 8,000 個家庭和 27,000 名個體的樣本資料，ENES 的發現顯示了各種不同形式的不平等，包括階級、性別、年齡、地區、環境、教育取得等等，如何交錯。資料也提供了

>>

一個社會的複雜圖像，可以讓地區內和地區間的比較普片化，提供一個有別於以往僅僅聚焦在都市地區的研究一個不同的圖像。

這類的研究讓我們可以對於阿根廷貧窮、邊緣化、社會不平等有更好的理解。透過呈現我們的研究發現不僅僅是在學術內，也包括民意的層次，我們希望可以產生民主的辯論，去辯論如何往前進。我們希望科學資孕將會深化和加入這個辯論，挑戰化約和簡單的社會論述，並且貢獻給公共政策的制定基礎，去面對阿根廷的社會議題。■

來信寄給 <agsalvia@retina.ar>
和 Berenice Rubio <beer.rubio@gmail.com>

> 研究阿根廷的社會資本

Gabriel Kessle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La Plata, 阿根廷, ISA未來研究委員會(RC07), 社會階層研究委員會(RC28)和社會心理研究委員會(RC42)委員



在2016年懷念真相與正義慶祝遊行上的年輕舞者。這是軍事政變的40週年。上千阿根廷民眾參加了，支持人權。Juanjo Domínguez攝影。

阿根廷的微觀社會關係為何呢？這些關係如何變化，而又和其他國家有什麼不同？而阿根廷的過去如何改變了現在的社會關係？PISA（阿根廷國立當代社會研究機構）的全國社會關係調查（ENRS）將會研究社會問題，並聚焦在社會資本，社會性，自我認同，社會障礙，緊張，參與，集體行動。考量到其地理範圍和主題，這個調查是首例，所以會提供新的資訊，並且作為其它拉美國家社會調查的架構。

之前阿根廷的研究從傳統的觀點去看網絡和社會資本，分析社會支持網絡在最不利的領域，像是在2001年危機之後。我們設計ENRS的時候，利用了國際研究的架構，希望可以讓比較研究得以進行，但是我們也調整去反映更多的地方特徵，按照最近的先導調查（質化和量化），我們將會在2017進行田野調查，這篇文章我將呈現主要的想法和假設，這些都是關於這項微觀社會關係的調查設計。

人們的個人關係網絡如何因為社會群體而有不同？我們可以找到任何規律性嗎？如果可

以，那會是什麼樣子？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使用了「姓名」產生器，讓我們可以重建受訪者的社會網絡。關鍵在於去判定過去比較緊密連結的阿根廷社會留下了什麼線索，又和最近的新自由主義階段有什麼不同。（如Salvia和Rubio在本期描述的一樣）。特別是我們想知道是否老一輩的人的網絡比起年輕一輩的更異質？而誰的社會化得以再破碎的社會下進行？此外，在先進國家和拉美國家，國際研究的證據顯示我們往社會階層下去，個人網絡包括了更多的親屬和緊密的關係，我們的假設是其他的區辨原則像是政治傾向，文化，消費的會和階級劃分有關，性別關係的改變也很重要，我其他去找到更多元的年輕女性網絡，因為她們越來越多人參與社會生活的各個面向。我們也會看是否年輕人的需你世界的高度參與影響了其網絡結構，超出線上網絡。這個調查也會研究現代和傳統地區的差別。

我們對於社會資本了解多少？它們如何被測量？這是本調查第二個模組。我們認真看待社會資本的概念，將其定義成關係和資源。的

>>

確，不是所有的關係都是具有相同價值的，因為其價值是其可以動員的資源數量和質量所決定。在新自由主義時代，跨國組織好像忘記了這點。許多政策制定者預設窮人可以透過其社會關係（並定義成社會資本）去克服困難處境，而不用去考慮其可獲得的資源，這挑戰了所謂資本的定義。

在拉美，對此議題有兩個相反的看法。一方面，古典的看法是道德經濟，連結到先驅性的智利人類學家 Larissa Lomnitz 於 1970 年代的研究，認為社會領域中的人弱沒有辦法透過市場和國家獲取需求，那就設法建立網絡生存。因此，地處邊緣的人會看到比較強的網絡。另外一方面，以 Robert Castel 的去附屬的概念，從勞動市場被排除是和社會退化有關的，這也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為如此。勞動排除將會侵蝕微觀的社會關係，而非強化知。我們的假設是兩個解釋對於最不利的群體而言都可能是對的，所以挑戰將是解釋未什麼我們找到一些去付屬性的例子，也找到了強化付屬性的利子。

我們也會研究網絡和資源之間的關係：什麼串播了，在什麼人之間傳播，以及透過什麼方式？串播交換包括了貨品，勞動合約，照顧，建議，支持等，我們希望去瞭解資源交換如何因為不同社會群體而不同。此外，我們也對於金錢的流通很有興趣，像是貸款、禮物、第三方付款等。希望可以檢視收與受，然後瞭解流通和互惠。再一次我們把社會資本看得很重要，就像是尋找「黃金接觸」一樣，也就是任何處於有利位置的關係，像是權力、金錢，以及或是社會接觸，誰可能有過特殊的流通，在什麼關鍵時間點。

那不同型式的社會性呢？這是我們第四個模組的問題，聚焦在友誼、家庭、更表達性的社會接觸，像是面對面或是虛擬的，這裡資本或是交換都不再重要。我們也想看關係的形式以及接觸的頻率，特別是人們和親戚之間的關係。

關於虛擬世界，我們期待發現其不但不會降低社會性，還會增加彼此，特別是年輕人之間的虛擬關係。但是阿根廷是個有著密集都市生活的國家，我們也關注社會性被實踐的地點，以及空間。此外，我們也研究人們和其他國家的連結，假設這會是個對於移民和上層階級重要的連帶。友誼對阿根廷社會也很重要，所以想研究其從哪來和從什麼空間來，並把不同社會化的場域考慮進去。

自我認同和社會障礙的模組則是研究自我認同和網絡建構的形式。這個意義上，我們希

望去判定什麼硬的偏見和刻板印象是社會障礙，以及當成立了關係網絡的時候是如何。還有，因為衝突是微觀社會關係的一部分，調查也會去看麻煩關係和衝突的類型，包括所有的暴力和侵害。

最後，我們也檢視不同的組織，花費的時間，以及進行的活動，這目的是研究人們的參與。普遍來講，之前的研究認為組織參與的層級很低，但是我們也有興趣去問是否社會媒體改變這個，也去問特殊和斷裂的參與形式，因為這些很可能被傳統調查所忽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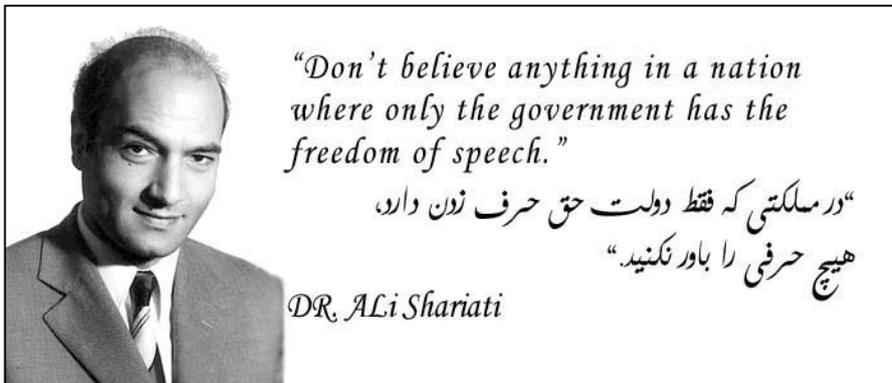
這些只是 ENRS 的某些方面而已，和 PISAC 一起，我們希望發展出一個對於阿根廷社會的重要理解，這是第一次有這種規模的嘗試。這也讓我們不僅僅可以更加瞭解自己的社會，也更和社會學中的國際討論有所對話。一樣中要得是我們希望調查將會對於將來的公共辯論以及社會科學對於公共政策的發展的貢獻，奠定紮實的基礎。■

來信寄給 Gabriel Kessler
<gabriel_kessler@yahoo.com.ar>

> Ali Shariati

被遺忘的伊斯蘭社會學家

Suheel Rasool Mir, University of Kashmir at Srinagar, 印度



Ali Shariati.

Ali Shariati (1933 – 1977) 是被廣泛認為是伊朗 1979 年革命的 Voltaire。他在一個宗教家庭出生，1963 年於獲得 Sorbonne 的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Humaines 得到博士學位，在 1977 年過世。在 Paris 他是很積極地閱讀 Karl Marx, Jean-Paul Sartre, Georges Gurvitch, Frantz Fanon 和 Louis Massignon 的，並且在前革命伊朗受到廣泛尊敬，其被認為是「找麻煩的伊斯蘭馬克思主義」，必須少說話。其特殊之處在於其把宗教整合到其他知識傳統。

Ali Shariati 博士是試圖去尋找在現代、西方主導的世界中穆斯林所面對問題之答案的穆斯林知識分子之一。其認為文化的重新導向去肯認個體能動性和自主性是可以幫助穆斯林社會去克服其停滯和發展落後的結構原因的。Shariati 的反殖民論述中強調了宗教在解放社會中的角色，呼應了 Frantz Fanon 對於「新人類」的訴求，其提出了「新思考」的想法，是一種「新人性」，追求更人性的現代性，這種現

代性不會去把第三世界變成歐洲，美國，蘇聯。

Ali Shariati 作為 20 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穆斯林思想家，其主要在闡釋伊朗於 1960 和 1970 年代的激進社會政治變遷的宗教論述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基於此原因，許多學者把 Shariati 看成是政治伊斯蘭的倡議者。而區別 Ali Shariati 和烏理瑪 (ulama) 的關鍵在於前者把宗教放在社會學得脈絡下來看代宗教的角色和功能，這與涂爾幹和韋伯是一致的。而其很大一部份的作品是和馬克思主義相關的。他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像是歷史決定論、階級鬥爭，去重新詮釋伊斯蘭。其神學馬克思主抑或是神學畫得馬克思主義是最有創意的知識貢獻。對他來說，重新詮釋過後的伊斯蘭必須在馬克思主義失敗的地方被需求。

以 Shariati 的觀點來說，宗教作為運動是一個現代思想 / 意識形態學派，而宗教作為制度則是一個教條的集合。在《Religion against Religion》一書中，Shariati 認為神職人員對於伊斯蘭經典詮釋的掌控

是為了建立一種神職的專制主義。以他的話來說，這會是人類歷史上最糟糕也最壓迫的一種專制，是「所有專制獨裁的源頭」。Shariati 強調：「宗教有兩個方面，彼此敵對。例如，沒有人像我一樣恨宗教，但是也沒有人向我一樣對宗教充滿了希望。」Shariati 成功地生產了一種激進的常民宗教，將其和傳統神職制度分開，並和世俗的社會革命、科技創新、文化自我肯認結合。

Shariati 相信只要啟蒙思考者、知識分子瞭解其信仰的真理，那麼社會變遷將會非常成功。知識分子階級是社會的良心，有責任開啟社會的復興和改革。所以年輕時候的 Shariati 偏愛「奉獻 / 指引的民主」。在《Community and Leadership》中它倡議「奉獻 / 指引的民主」的概念，認為知識份子有責任去喚起公共意識，指引民意，特別是在革命後轉型期間。他作為一位社會運動者也總是關心社會正義和試著開創一個平等主義的社會。現有的民主是很有線的，而 Shariati 最大化的觀點訴求

的是激進的民主。

Shariati 的強烈平等主義思想和對於階級不平等的批判讓他成為了一個社會主義的思想家。然而，對他而言，社會主義不僅僅是一種生產模式，還是生活模式。他批判國家社會主義對於個人、政黨、國家的集體崇拜，提出一種「人道社會主義」的想。按照 Shariati 的話來說，國家的正當性從公共理性和自由集體意志而來，對他來說，自由和社會正義必須互補於現代的靈性。他的自由、平等、靈性的三元結構是一個對於「另類現代性」的創意貢獻。

Shariati 的遺產和當代的追

隨者已經貢獻給了一種對於錯誤二元對立的解構的努力，像是伊斯蘭 / 西方，東方 / 西方。他倡議一個超越兩極的第三條路，其思想和其他當代的改革主義思想家，像是 Abdolkarim Soroush 和 Abdullahi Ahmed An-Na' im 的伊斯蘭自由主義，有著相同之處。Shariati 對於社會學得貢獻在於批判指出非西方社會的西方文明化宰制和預設。其許多的著作和當代世界息息相關，而且非常有用，歷久彌新。■

來信寄給 Suheel Rasool Mir
<mirsuhailscholar@gmail.com>

> 《全球對話》 中文編輯



| 何經懋

何經懋於 2010 年擔任台灣大學社會系特聘教授陳東升的研究助理時有幸加入了《全球對話》的編輯團隊。一開始頭幾年陳東升教授指導翻譯和編輯的工作（偶爾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張茂桂教授也會給予建議和指導）。從第一卷第一期開始，何經懋就很享受這份工作所帶來的樂趣，也從中學習到了很多新的人事物。他現在是美國 Cornell University 的社會系博士候選人，在此之前於台灣大學取得了社會學和資訊工程的碩士學位。其研究知識分子象徵鬥爭的碩士論文獲得台灣社會學會頒發最佳碩士論文獎。他的博士論文從比較和歷史的角度去研究統計學和民族國家建構的關係，此外，其研究領域還包括了政治社會學，科學和技術研究，跨國社會學，量化方法論，理論。■

來信寄給何經懋
<hojingmao@gmail.com>